



中国藏西夏文献综述^①

一 国家图书馆藏卷综述

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有一大批七八百年前的西夏文文献，世间稀有，至为珍贵，是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度藏。

1917年宁夏灵武县知事余鼎铭修城时，于城墙内掘获两大箱西夏文文献，送往宁夏镇守使署^②。大部分文献于1929年运至北京。当时专家认为“此项经文从未见于著录，最为稀世之珍函，应集中一处，供学者之研究”。当时的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对这批文献十分重视，不惜用重金购买下来。这些文献计百余册，蔚然成为大观。当时另一部分文献被地方官吏瓜分，散失各地，辗转传藏于甘肃、宁夏，部分流失于日本。

为使读者了解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的概况，以下对馆藏文献的数量、种类、内容、价值以及整理沿革作概要介绍。

（一）数量和种类

1932年周叔迦先生整理这批文献时，共有13种100卷，20世纪70年代整理时共17种114部。本世纪初整理和修复时又新发现一些文献，使文献达到20种，124卷佛经。此外还在修复时揭裱出西夏文、汉文文书单页和残页计270多页，已考知文献30多种，使国家图书馆的西夏藏品种类更加丰富。全部文献共8000多页面，除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以外，这里是世界上入藏西夏文献最多的部门。我国目前所存古代宋、元时期的文献皆是珍贵文献。国家图书馆珍藏的西夏文文献属宋元时期，十分宝贵。

馆藏文献中主要是佛经，以经藏为主，也有律藏和论藏。西夏社会文书多为残片，但类型不少，价值很高。

1. 宁夏灵武出土文献

（1）《金光明最胜王经》卷1（2种）、卷3、卷4（2种）、卷5（4种）、卷6（2种）、卷8、卷9、卷10（2种），共15卷。

（2）《慈悲道场忏罪法》卷1、3~10，共9卷。

（3）《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卷上、下，共两卷。

（4）《悲华经》卷9，1卷。

（5）《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卷5，1卷。

（6）《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1卷。

①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藏西夏文献研究》，项目批准号：06AMZ001。

② 《甘宁青史略正编》卷29载，民国六年“九月，宁夏灵武发现西夏写经”，后注“灵武县知事余鼎铭修城，於城内掘获西夏写经两大箱”。又近人冯国瑞根据保存部分西夏文献的张质生先生的叙述记道：“安康人余鼎铭字介彝，民八知灵武县事，于近郊番寺旁农人耕地得明布政使王骥墓及五瓦坛藏，内藏夏文经甚多。”所记与前时间、地点皆有出入。参见张思温《活字版西夏文〈华严经〉卷十一至卷十五简介》，《文物》1979年第10期。

- (7)《金刚萨埵说频那夜迦天成就仪轨经》卷 2, 1 卷。
- (8)《不空羼索神变真言经》卷 18, 1 卷。
- (9)《经律异相》卷 15, 1 卷。
- (10)《添品妙法莲华经》卷 2, 1 卷。
- (11)《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卷 15, 1 卷。
- (12)《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卷下, 1 卷。
- (13)《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中, 1 卷。
- (14)《菩萨地持经》卷 9, 1 卷。
- (15)《大智度论》卷 4, 1 卷。
- (16)《大方广佛华严经》(泥活字本)卷 51、71, 共 2 卷。
- (17)《大方广佛华严经》(木活字本)卷 11、12、14~16、19~23、27~33(2 种)、34、35(2 种)、37(2 种)、39~45(2 种)、46、48、51、53、54、57、59~65(2 种)、66(2 种)、67(2 种)、68、69(2 种)、70(2 种)、71(2 种)、72~75、79、80(2 种), 共 63 卷。

2. 黑水城出土的文献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 18、21、22、26、27、34、71、93~97、103、104、112、113、281、283、293、294、355, 共 21 卷。

3. 单页收集品

- (1)《瓜州审案记录》。
- (2)《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4. 文献封面、封底裱糊纸剥离出的西夏文和汉文文献残页

西夏文文献残页:

- (1)《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 (2)天庆甲寅年黑水监军司告牒文书。
- (3)告状案。
- (4)审案状。
- (5)军抄人员装备文书。
- (6)户籍。
- (7)人口簿。
- (8)贷钱账。
- (9)粮账。
- (10)卖粮账。
- (11)贷粮账。

汉文文献残页:

- (1)《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
- (2)《般若心经》。
- (3)《大方广佛华严经》。
- (4)《妙法莲华经》。
- (5)《佛母大孔雀明王经》。
- (6)《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
- (7)《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略疏注》。
- (8)《大方广佛华严经疏》。
- (9)《金刚般若经疏论纂要》。
- (10)《慈悲道场忏法》。
- (11)《瑜伽集要焰口施食仪》。

- (12)《宗镜录》。
- (13)《永嘉集》。
- (14)《佛祖历代通载》。
- (15)《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
- (16)《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

此外还有一些汉文《大藏经》中没有或未知名的西夏文佛经残片。

（二）文物价值

馆藏西夏文献距今有七八百年的历史，皆属善本之列。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献，数量巨大，内容丰富，但从其文献的时间段来看，基本上是西夏时期，西夏灭亡以后的文献很少。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不仅有西夏时期的，还有西夏灭亡后已经确立了蒙古统治、元朝尚未建立时期的，也有元代的文献。元代文献有纪年可考的又包括成宗、武宗、仁宗三个时期。蒙元时期的西夏文献，反映了这一时期西夏文字使用和流行的状况和特点，也间接地折射出使用西夏文的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后裔在当时的政治、文化地位，以及蒙元时期的民族政策和民族语言文字政策。可以说，这些跨越几个历史时期的典籍有其特殊的文献价值。馆藏文献中有不少属于海内外孤本，如《不空罽索神变真言经》《经律异相》《悲华经》《金刚萨埵说频那夜迦天成就仪轨经》等，十分珍贵。另有一些文献其他部门虽有收藏，但与国家图书馆所收或卷次不同，或版本不同，也应属于孤本。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大方广佛华严经》《添品妙法莲华经》等皆属此类。总之，馆藏大部分西夏文文献都是珍贵的孤本。

馆藏文献中也有一定数量的世俗文献，其中有西夏文文献，也有汉文文献，都有各自的特殊价值。比如馆藏有两页瓜州审案记录，是西夏天赐礼盛国庆年间瓜州（今甘肃省安西县）审理民事经济纠纷案件的真实笔录。用这些稀见的社会文书研究西夏的经济和法律很有价值。

瓜州审案记录的背面是西夏文草书《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坛经》是禅宗六祖惠能出家、受法、传法等事迹及其语录。这种《坛经》接近敦煌所出法海唐中期古本，并可用于校对法海本的疑误，很是珍贵^①。

馆藏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卷首有版画《西夏译经图》，刻僧俗人物 25 身，有西夏文题款 12 条计 63 字，记图中主要人物的身份和姓名。上部正中跏趺而坐的高僧为“都译勾管作者安全国师白智光”，即译场主译人。旁列 16 人为“助译者”，其中 8 个僧人分别有党项人或汉人名题款。图下部绘西夏惠宗秉常及其母梁氏皇太后。此图形象地描绘了西夏译经的场面和皇太后、皇帝重视译经，亲临译场的生动情景。我国有漫长的译经史，但利用形象的手段描绘译经的场面，而又保存至今的只有这幅译经图，其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都十分珍贵^②。

西夏文刻本佛经《慈悲道场忏罪法》各卷卷首皆有忏法本事图一幅，即梁皇宝忏图，绘梁武帝时郗氏生前狠毒，死后化为蟒蛇，夜入宫求梁武帝超度，梁武帝集佛经超度，使郗氏得以升为天人的故事。图中在关键之处有西夏文注释。全图结构复杂，有 44 身不同类型的人物，有深浅有致的建筑，画面以浪漫主义手法使不同时间的几个情节集于一图，互相衔接，是利用有限的图幅描绘复杂故事情节的杰作，已具有连环画的雏形。

另有些佛经前有版印经图，如《经律异相》《大方广佛华严经》卷首的释迦如来说法图，有的布局精巧，刻工细腻；有的分解构图，似连环画，是研究中国早期版刻图画艺术的重要资料。版画中西夏人物的服饰，是探讨当时服饰的珍贵素材。

国家图书馆西夏文献的纸张是研究古代西夏、元代纸张的珍贵实物资料，封面和题签的绢绸又是研究当时丝绸质料、制作工艺的有价值的资料。由于过去西夏文献和文物的缺乏，这些珍稀文物可能填补古代纸史和纺织史上的某些空白。

（三）学术价值

馆藏西夏文文献的特色就是多以少数民族文字西夏文书写或印刷。西夏文和汉字都是方块型的表意文字。西夏文仿汉字的结构和笔画创制，乍一看很像汉字，细看无一字与汉字相同。近代解读已经死亡的西

① 史金波：《西夏文〈六祖坛经〉残页译释》，《世界宗教研究》1993 年第 3 期。

② 史金波：《〈西夏译经图〉解》，《文献》1979 年第 1 期。

夏文有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起到突出的作用。当俄罗斯所藏西夏文文献尚未公布的时候,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是专家们可以利用的主要资料。老一辈学者王静如先生利用这些资料对译经文,诠释文意,作出了重要贡献^①。

馆藏西夏文献是研究西夏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特别是其中有几种文献对研究西夏佛教史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卷末有发愿文,概述了佛教在东土盛行、传译佛经、三武毁佛等佛教在中原流传的基本史实,又重点记述西夏时期发展佛教、翻译并重校佛经的情况,以及西夏灭亡后元代雕刊西夏文佛经并多次印刷的经过。此文是一篇简明西夏佛教和西夏文佛经的源流史。由此我们第一次知道,从西夏第一代皇帝元昊建国当年即开始组织译经,以国师白法信、白智光等 32 人为首,历经四朝,仅用了 53 年的时间就将汉文大藏经翻译成西夏文,称作“蕃大藏经”,共译 362 帙、812 部、3579 卷,后西夏仁宗皇帝时又与南北经重校^②。显然这一发愿文为西夏译经史提供了最关键的资料。

馆藏《金光明最胜王经》第 1 卷卷首有《金光明最胜王经流传序》,记载了《金光明经》流传东土后先后五次由梵文译为汉文的经过,还特别记述了西夏时期翻译、校勘此经的经过以及在西夏倡导、传播此经的情况,指出是明盛皇帝(惠宗)时由国师白法信“译汉为番”。最后还提及西夏灭亡后此经的遭遇与序言作者的发愿。另此经卷 10 末尾有跋文 1 面,记载了刊印时间起自乙巳年,完成于丁未年。据考证应是尚无年号的蒙古乃马真称制的 13 世纪中期^③。可见,此流传序和跋对研究《金光明经》在中原地区和西夏的流传,以及此经译、校、刻印历史有重要价值。

更可喜的是在最近整理、修复馆藏西夏文献时,在佛经的封面、封底中新发现很多文献残页,其中有西夏文,也有汉文。西夏文文献有西夏法典刻本《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天庆甲寅年黑水监军司告牒文书、告状案、审案状、军抄人员装备文书、户籍、人口簿、贷钱账、粮账、卖粮账、贷粮账等。如据一件卖粮账可推知西夏七斗麦价值一贯以上,二斗麦四百多钱,当时麦价应是每斗二百多钱^④。这是直接反映西夏社会生活很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

(四) 版本价值

馆藏西夏文献中有不少写本,其中以《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为主,这些写经字体各异,出自不同抄经生之手,皆是七八百年的古本,也很珍贵。在该经卷第 18 卷首发现有泥金写经题签,纸质高雅,缮写精致,是稀见的题签。

馆藏西夏文献更多的是印本,其中大多字体清晰,版面疏朗,刻印精致,是中古时期的优秀版本。通过这些印本可研究西夏和元代的印刷和版本。

馆藏西夏刻本中有的还记载了刻工姓名,这不仅能了解当时的刻工情况,还能通过刻工考究文献的版本。如《慈悲道场忏罪法》卷第 1 卷首《梁皇宝忏图》有汉字“俞声刊”三字。俞声是元代杭州地区刻工,曾为宋两浙茶盐司雕刊的《礼记正义》和杭州刻本《尔雅疏》补板^⑤。可证馆藏西夏文《慈悲道场忏罪法》的《梁皇宝忏图》为元代刊印。在卷 1 正文前,有元代奉敕在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集此经的西夏文小字刻款,也证此经为元代刊印。

又如《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有汉字刻工名“台周”。该经卷末有元皇庆元年(1312 年)西夏文发愿文。《金刚萨埵说频那夜迦天成就仪轨经》的刻工中也有“台周”,尽管该经中没有记载刊印时间,也可推定其时代大致与《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同时。再有《金刚萨埵说频那夜迦天成就仪轨经》的刻工有“周子俊”,而《不空罽索神变真言经》中也有刻工“周子俊”,也可证两部经是同时代的刻本。

党项人在元朝属色目人,其上层有较高的地位,当时党项人的文化和风俗习惯还有相当的保存。元朝政府在民族政策上对党项族有所照顾,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 年)曾下令于杭州万寿寺雕刊河西字《大藏经》,即西夏文《大藏经》。世祖去世后,元成宗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 年)“罢宣政院所刻河西

① 王静如:《西夏研究》(第 1、2、3 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 年。

② 史金波:《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译证》,《世界宗教研究》1981 年第 1 期。

③ 史金波:《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世界宗教研究》1983 年第 3 期。

④ 史金波:《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社会文书残页考》,《文献》2004 年第 2 期。

⑤ 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

《藏经》板”^①。后来又恢复刊印。据上述《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所载，知于大德六年（1302年）刊毕。元平江路磧砂延圣寺刊印的《大宗地玄文本论》卷3有发愿文记：“管主八誓报四恩，流通正教，累年发心，印施汉本大藏经三十余藏，四大部经三十余部……心愿未周，钦睹圣旨：‘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刻河西大藏经板三千六百二十余卷，华严诸经杆板，至大德六年完备。’管主八钦此胜缘，印造三十余藏，及《华严大经》《梁皇宝忏》《华严道场忏仪》各百余部，《焰口施食仪轨》千有余部，施于宁夏、永昌等寺院，永远流通。”^②管主八原是西夏人，任松江府（今上海）僧录，其名为藏文译音，意为经学大师。这一记载确切地印证了元代曾雕刻全部西夏文大藏经以及其他单部佛经的事实。有元一代多次印刷西夏文大藏经，先后总计至少190藏。近年敦煌北区发现的西夏文刻本佛经残页《龙树菩萨为禅陀迦王说法要偈》经末有一长方形压捺印记，上有汉文两行：“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八施大藏经于沙州文殊师利塔中永远流通供养。”^③此题款证实管主八主持印制西夏文大藏经，并施于敦煌佛塔中。可能在他所施经中都押捺了这样的印记。

元朝刊印的西夏文大藏经的形制，过去无从知晓。馆藏西夏文《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顺正理论》《悲华经》有祝赞4面，祝赞中西夏文题款译文为“奉大元国天下一统世上独尊福智名德俱集当今皇帝圣寿万岁敕，印制一全大藏经流行”，“当今皇帝圣寿万岁”，“太后皇后与天寿等”，“奉敕大德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皇太子使见千秋，印大藏经五十部流行”。知此经为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印制。又《添品妙法莲华经》有祝赞3面，其中题款译文为“当今皇帝御印”，“仪天兴圣仁慈昭懿寿元皇太后御印”，“正宫皇后御印”。仪天兴圣仁慈昭懿寿元皇太后是元武宗和仁宗的母亲。知此经为武宗或仁宗时印制。馆藏元代西夏文佛经真实地展示出元代刻印西夏文经的形制。这批西夏文经纸质优良，皆经折装，字体秀美，刻印精细，墨色纯正，是古代上乘的印刷品，具有重要版本价值。

特别可贵的是馆藏几十卷活字印本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该经不少页面中有字形歪斜现象，有不少常用字与上下左右墨痕深浅差别明显，在经纸背面可见到以字为单位透墨深浅不一。这些都是初期活字印刷时特有现象。特别是此经卷40有西夏文题记两行，译成汉文是：“实勾管作选字出力者，盛律美能慧共复愿一切随喜者，皆共成佛道。”“选字”应是拣字、排字，“选字出力者”应是拣排活字的工匠。在日本京都大学所藏此经卷5有西夏文题记两行，译成汉文是：“都发愿令雕碎字勾管为印者都罗慧性，复共一切发愿助随喜者，皆当共成佛道。”“碎字”，即为活字。这两条西夏文题记是证实这种《华严经》为活字本的确凿证据^④。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活字印本卷首前三行不是活字版，而是镶嵌在活字版中的小型雕版。这三行是经名、译经和校经题款，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契”，“唐于闐三藏实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因为这些字在各卷首都相同，雕刊一次可以用于《大方广佛华严经》全部80卷，即可使用80次。确实是省工省力的方法，表明西夏人应用活字印刷时灵活操作，以方便印刷为原则，反映了西夏活字印刷的特点和水平^⑤。

还应该特别提出的是在《现在贤劫千佛名经》的背面有多种裱糊经纸，其中有《大方广佛华严经》卷71，共40多面，此外还有卷51的个别页面。仔细观察这些文献的版面、字迹，具有泥活字印刷的特征。其中很多字笔画中间断折，有的字有明显的笔画缺损痕迹，有的字边缘不整齐，有断残现象，甚至有的字由于缺角而显得近于浑圆，有的笔画中有类似气泡、沙眼的痕迹，有的文字模糊，字的边缘形成蜡泪状，这是烧制活字时温度太高，造成的流釉现象所致。这些都体现了泥活字印刷的特点。这些文献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泥活字印本。

中国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毕昇发明了省时省料、方便快捷的活字印刷术^⑥，这是印刷史上又一个伟大的里程碑。然而中国早期活字印刷实物在中原地区都没有保存下来。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不

① 《元史》卷18《成宗纪一》。

② 该卷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山西崇善寺和日本善福寺。

③ 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文献初探》，《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

④ 史金波，黄润华：《北京图书馆藏西夏文佛经整理记》，《文献》1985年第4期。

⑤ 史金波，雅森·吾守尔：《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⑥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18，技艺·板印书籍条。

久,西夏人便开始使用泥活字印刷,并由泥活字发展到木活字印刷。此前只知一种西夏文泥活字印刷品,国家图书馆藏泥活字版《大方广佛华严经》是新发现的品类。

修复馆藏西夏文文献时,在佛经的封面、封底中新发现的文献残页中,还有刻本、写本佛经。新发现汉文文献刻本有《般若心经》《妙法莲华经》卷7、《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卷下、《慈悲道场忏法》卷9、《宗镜录》卷91、《禅宗永嘉集》《金刚般若经疏论纂要》卷下、《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略疏注》卷下等,此外还有写本。引人注目的是这些从封套中发现的残页有明代的文献。很可能是保存这些西夏、蒙、元时期佛经的寺庙,在明代对佛经又进行修复,裱糊封面、封底,而使用了当时废弃的明代残经所致。

此外,由于宋元时期书籍的稀有,馆藏西夏文文献的版式、书法、装帧等也是中古时期版本研究的重要内容。

(五) 整理沿革

馆藏西夏文文献,于20世纪30年代由周叔迦先生整理编目,以《馆藏西夏文经典目录》为题发表于《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4卷3号《西夏文专号》上^①。目录中抄写西夏文经名和重要款识,并译成汉文,同时录记形制,间有考证,功力深厚,难能可贵。这一目录的刊布使学术界第一次了解到北京图书馆丰富的西夏藏品。王静如先生在研究过程中也进行整理和考证,做了大量工作。

“文革”时期,史金波于1972年重新整理馆藏西夏文献。当时在北京图书馆黄润华先生的帮助下,用了近3个月的时间对馆藏的百余部西夏文文献,作了详细记录,翻译经名、款识、序跋和原文,整理散乱页面,并发现馆藏有重要变化。馆藏增加了原为俄罗斯所藏黑水城出土的21卷佛经,也缺失了一些原有的卷册。缺失的部分卷册,现借存在台湾故宫博物院^②。

1955年印度维拉博士曾到北京图书馆拍摄少数民族文献。国家图书馆档案1955年善字第598号发文附件载“印度维拉博士借照北京图书馆所藏满、蒙、维、藏、梵文书籍佛经目录”,其中有西夏文佛经100余册之记载^③。这次拍照是国际性活动,其中也包括拍摄部分苏联藏黑水城出土文献。可能拍照结束后,将苏联藏的部分文献归还给当时的北京图书馆。1973年英国学者格林斯坦德(Eric Grinstead)在印度出版了9卷本《西夏文大藏经》,将维拉博士拍摄的西夏文文献编辑出版,其中包括了北京图书馆和苏联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藏的部分佛经^④。1982年史金波又和黄润华先生利用几个月的时间对这批西夏文文献进行整理,对文献的卷次、品名、题款、序言、跋尾和发愿文作了进一步考察和分析,对版本时代、文献的真伪以及标号、活字本等问题也有初步的研究,并写出了整理记^⑤。后在史金波著作的《西夏佛教史略》一书的附录中收入了馆藏佛经目录,包括了上述两部分文献^⑥。2001至2002年,史金波与国家图书馆王菡、全桂花、林世田同志再次对馆藏西夏文文献进行整理,进一步核对文献的细部,包括书耳处记载的书名简称、刻工等,对这批文献又有新的认识,并刊布了较详细的目录^⑦。2003年国家图书馆决定对馆藏西夏文文献进行修复。这批文献历经数百年沧桑,辗转收藏,虽整体保存良好,但很多卷册有不同程度的残损,其中数十卷佛经在折面处断裂,造成页面错乱,难以连贯,虽几经整理排序,但借阅后又前后颠倒,次序紊乱。史金波受国家图书馆委托,在善本部的协助下,前后花费了约一年的时间,对几十卷散乱的西夏文佛经逐页缀连拼合,庶几完善。在整理、修复工程中,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主任张志清和部内很多同志参与组织策划、编辑整理、揭裱修复,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郑贤兰、全桂花同志参与编排、核对原文,联络修复,精心负责。在此书出版之际,对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专家们的有效工作和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另在修复中又于文献封面、封底裱糊纸张中发现了更多西夏文、汉文

①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编辑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

② 参见胡进杉《西夏文刊本〈金光明最胜王经〉的两幅扉画》,《法光学坛》,2002年第6期。

③ 国家图书馆档案1955年善字第598号文附件。参见王梅堂,谢淑婧《北京图书馆藏民族文字部分佛教经典简述》。

④ 格林斯坦德:《西夏文大藏经》(9卷本),新德里,1973年。

⑤ 史金波,黄润华:《北京图书馆藏西夏文佛经整理记》,《文献》1985年第4期。

⑥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⑦ 史金波,王菡,全桂花,林世田:《国内现存出土西夏文献简明目录》,《国家图书馆学刊》(西夏研究专号),2002年增刊。

文献页面。国家图书馆林世田、全桂花、李际宁、郑贤兰同志对汉文文献作了考证和定名^①，史金波对西夏文文献作了初步译释和定名。

现在出版的《中国藏西夏文献》中，国家图书馆所藏西夏文献占有很大比重。所使用的底本即经过多次整理的原本。（史金波）

二 北京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故宫博物院藏卷综述

北京地区藏有西夏文文献的部门，除国家图书馆以外，还有北京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故宫博物院。这些部门所藏西夏文文献不多，但各有特色。

（一）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数量不多，但来源复杂。其中包括正面为《瓜州审案记录》，背面是《六祖大师宝坛经》的写本3纸。这3纸可能都是收集品，也还不是一起入藏的。首先，第1、第2纸和第3纸的编号不同，前两纸编号为X1-1（01639），第3纸编号为622573（419 510 10a），若一起入藏可能会有统一编号。另第3纸单独置一信封中，信封上印有“北京邮购书店”和信封下款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七十九号”字样，又有墨笔书写：“注意：西夏文一张20.00”，应是此一纸单独入藏，当时价20元。

这3纸写本残页为早期西夏文文献，正背两面都有特殊的价值。正面为西夏天赐礼盛国庆年间瓜州地区民间经济纠纷案件的审问笔录，背面是著名佛教禅宗著作《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的译文，此种《坛经》接近敦煌所出法海唐中期古本，并可用于校对法海本的疑误，很是珍贵^②。此类文献存世的仅有十多纸，分藏于海内外多部门，其中以北京大学所藏最多，而《瓜州审案记录》反映了11世纪西夏王朝的审案程序和社会状况，十分珍贵，又有年号和朱印，更具考证价值。

北京大学图书馆还藏有刻本和写本西夏文佛经残页，其中一纸刻本后有题款，最后一行为译者人名，译文为：“领占答名讹六番译”。“领占答名”为人名，“讹六”为番姓，“番译”意为译成番文，即西夏文。从人名“领占答名”看，为藏语，目前此类人名只发现在元明时期的西夏文文献中，在西夏时期的文献中尚未得见，可初步推定此文献为西夏以后的作品。

（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夏文文献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夏文文献仅有正面为《瓜州审案记录》，背面是《六祖大师宝坛经》的写本一纸，也是收集品，系1963年购进。1972年史金波曾到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查阅西夏文物、文献，当时看到此件以及西夏文官印、钱币、铜牌、铜小刀等。陈炳应教授在其《西夏文物研究》一书中曾收入此件《瓜州审案记录》一面照片，并进行了翻译^③。此次将正反两面同时发表。

（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西夏文文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西夏文文献据传是得自黑水城。1927年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和中国考古学专家徐炳昶组成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考察团员黄文弼教授曾单独赴黑水城考察。据他1930年10月回到北平所作的报告中称：“当大队抵额济纳河休息时，我则乘间出发考查，先由额济纳河故道北行，途中发现古庙，采拾残纸甚多。”^④据报道，黄文弼在黑水城中采集了文书残页数百件，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⑤。20世纪80年代史金波曾就此事请教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徐苹芳，不久徐苹芳先生将一沓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复印件交史金波，其中仅有西夏文残页、残片数纸。今年史金波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任所长刘庆柱联系，希望能按《中国藏西夏文献》出版计划，将

^① 林世田，全桂花，李际宁，郑贤兰：《国家图书馆西夏文献中所见汉文文献》（提要），《文津流觞》特刊（2005年国际敦煌项目（IDP）第6次会议手册），总第14期，2005年4月。

^② 史金波：《西夏文〈六祖坛经〉残页译释》，《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3期。

^③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④ 黄文弼：《略述内蒙古、新疆第一次考古之经过及发现》《河西古地新证》，《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⑤ 李逸友：《内蒙古历史名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

这部分西夏文文献收入。刘庆柱教授热情协助询问、查找。但不巧考古所准备搬迁，文献资料都已装箱，一时难以取出利用。现只好将史金波得到的原复印件加工刊印，好在文字尚清晰，其中一件文字较多的是西夏文刻本《妙法莲华经》卷1残页。文献虽少，但系中国专家自黑水城所获，且从未发表过。

（四）故宫博物院藏西夏文文献

故宫博物院藏有两种西夏文文献，原为近代著名画家、篆刻家、文物收藏家徐宗浩（1880~1957年）收藏。徐先生字养吾，号石雪，祖籍江苏常州，久居北京，民国期间曾任北京古物陈列所顾问。1958年其家属将此两种文献捐献国家文物局，后调拨给故宫博物院收藏。

两种西夏文文献中，一为木活字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74，系1917年宁夏灵武县知事余鼎铭修城时，于城墙内所得西夏文文献之一，其来源及其版本、价值已于国家图书馆藏卷综述中论及。国家图书馆也藏有木活字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74，但卷首无经图、祝赞牌，故宫所藏此卷则有经图一幅5面和空白祝赞牌1面。此卷末有北京广济寺主持现明所书后记，其开始称“己卯菊月二十三日无畏周居士携来广济寺”。现明（1880~1941年），号永芝，湖南衡阳市人。所记周居士为周肇祥（1880~1954年），字养庵，浙江绍兴人，曾代理湖南省省长，后任北京古物陈列所所长。晚年从事绘画，任东方绘画协会干事、委员，在北京主办中国画学研究会。该经册后附有周肇祥题跋2页，后署“中华民国第一戊寅六月十九日，佛弟子周肇祥谨跋”，再署“是卷计佛画三页经文二十八页，己卯夏六月周记无畏”。可知此经曾由周肇祥所得，并于1939年携至广济寺与人共赏。题跋中有“无畏”“肇祥”朱印。后转入徐宗浩手中。

另一种为西夏文刻本《高王观世音经》，为明代刊印。1974年史金波在故宫博物院罗福颐先生事先安排联系下，到故宫博物院看阅此经卷。当时还被允许拍摄了局部照片。后史金波、白滨发表论文《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介绍并初步研究了此经卷。经卷后有发愿文34行，其中有年款，译文为：大明朝壬子须能斗盈五年正月十五日。根据壬子五年以及发愿文中“皇太子千秋依见”的语句，定为明洪武五年（1372年）^①，也有人认为“须能斗盈”是明代年号“宣德”的反切译音。然而明宣德时期壬子并不是五年，而是七年。刻印时间为“大明朝壬子”，查明朝壬子五年有二。一为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五年，一为明孝宗朱佑樘弘治五年。发愿文第13、14行又载：“当今皇帝万岁俱来，皇子太子千秋依见。”据《明史·太祖纪》记载，朱元璋洪武元年立世子标为皇太子，洪武二十五年朱标死去。又《孝宗纪》载，朱佑樘在弘治五年三月立皇太子。此经刻印在正月十五日。可以初步肯定发愿文所指太子不是朱佑樘之子，而是朱元璋之子朱标。此经刻印年代也可相应断定为明洪武五年，即公元1372年^②。

文中发愿刻印者多为音译人名。其中姓氏“移訛訛”、耶和、平尚等皆为党项族姓。这些党项人的后裔占发愿刻印佛经人数的绝大部分，特别是第一人党项人“移訛訛”氏官居都督，秩从二品，是高级军事将领。以他为首，这些党项人仍用本民族文字印制佛经，祈福禳灾。经卷文字整齐、清晰，字体流利、纯熟，证明西夏灭亡一个半世纪后，西夏语还是活的语言，西夏文作为党项族的交际工具还在本族中流传。这一经卷是党项人消亡前最后的历史见证之一，具有珍贵的文物和文献价值。

本卷在编辑过程中得到北京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的真诚合作和大力支持。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部张玉范教授、主任沈乃文研究馆员、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朱凤翰教授、盛为仁和王秋芳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徐苹芳研究员、所长刘庆柱研究员、故宫博物院罗随祖先生、傅红展先生、袁杰女士、郭雅玲女士都给予我们热情合作和帮助。在本卷出版之际，对上述合作单位和专家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史金波）

三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藏卷综述

宁夏是西夏统治的中心地区，地上地下保存了大量的西夏遗址和遗物。近20年来，经文物考古工作

① 史金波，白滨：《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② 李范文：《关于明代西夏文经卷的年代和石幢的名称问题》，《文物》1979年第5期；史金波，白滨：《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再探》，《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

者的不懈努力，挖掘清理了许多西夏遗址，出土了大量十分珍贵的西夏文物，为了解和研究西夏王朝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其中绝大部分文物现保存于宁夏博物馆。

（一）来源、数量与种类

宁夏博物馆所收藏的西夏文物除个别是征集的以外，多为考古发掘品，数量已经达到千余件。按质地划分有：

其一，西夏文、汉文纸质文献，绝大多数为佛教文献，包括译自汉、藏文字的佛教经典，出土地点在108塔、宏佛塔、康济寺塔、拜寺沟方塔；其二，陶瓷器，包括生活用陶瓷物品、建筑构件和工艺品等，主要出土于西夏陵、灵武磁窑堡和回民巷；其三，绘画，多为唐卡，主要出土于宏佛塔、拜寺口双塔、108塔；其四，金属器，包括金、银、铜器铸造品，主要出土于西夏陵、宏佛塔、灵武石坝村；其五，纺织品、竹木器，包括木制器具，以及绫绢等丝织品，主要出土于西夏陵、宏佛塔、拜寺口双塔；其六，金石，主要是出自西夏陵的石碑石刻，另外，还有一些征集的铜牌、官印和钱币等。

其中宁夏博物馆所收藏的西夏文献也分出土和传世两种，包括纸绢、木简、石碑石刻和金属器4个大类。

1. 出土文献

（1）宁夏灵武出土文献

主要是指西夏文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第76卷，该佛经原为罗雪樵先生所有。罗先生是银川一中语文教员，学识广博，也是研究西夏的学者之一。他藏有西夏文《华严经》卷26、57、76共3卷，是1947年“从一个灵武人手里买的”，解放后，曾多次借给宁夏博物馆到北京展览，现只有第76卷存于宁夏博物馆。此种西夏文《华严经》是1917年9月宁夏“灵武县知事余鼎铭修城，在城墙内掘获西夏文写经两大箱”，后辗转流传，现大部分为北京图书馆收藏，宁夏博物馆、宁夏罗雪樵先生、甘肃张思温先生、日本京都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也有零星收藏。此卷来源同国家图书馆所藏该经文物、学术、版本价值相同。（见本书北京编国家图书馆藏综述）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本活字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很多，共63卷，不重复卷52卷，但恰缺卷76，宁夏博物馆藏本正好能补所缺，可称海内外孤本。经研究，西夏文《华严经》是活字印本，这一发现对研究西夏文字、西夏佛教及木活字印刷术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1996年经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为一级品。

（2）宁夏青铜峡108塔出土文献

青铜峡108塔位于宁夏青铜峡市峡口山一处面东的山坡上，由108座喇嘛式实心塔组成。整组塔依山而建，从上到下按一、三、五、七等奇数排列，共12行，形成巨大的三角形塔群，塔的总数为108座，故称108塔。1987至1988年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对塔群进行了清理发掘和维修加固，出土砖雕佛像八尊、彩绘泥塑像四尊、陶塔刹顶3件，另外还有一些建筑构件和一卷西夏文的佛经残页。从维修勘测时发现的建筑遗迹和出土文物判断，108塔始建于西夏，元、明、清三代曾数次修葺，其总体布局和基本形制仍保存着始建时的风格。在塔群前的河滩上，原来还有寺庙遗址和两座小砖塔，因修建电站的水坝而被淹没。

从小塔内清理出西夏时的绢质彩画（唐卡），木版残经，陶质塔模、陶质造像等文物。其中西夏文佛经残页，出土时经书已朽烂粘连，经过清理，可见有两种纸色，一种纸色泛白，保存页数较多，已腐烂粘连成一叠，经史金波先生释读，为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另一种纸色泛黄，仅存残页一张。

（3）宁夏贺兰县的宏佛塔出土文献

贺兰县宏佛塔位于贺兰县潘昶乡红星村东面的一处庙寺内，是一座砖筑的三层八角形楼阁式与覆体式兼备的复合体建筑。其造型独特、风格古朴，是国内罕见的一座古塔。1989年至1990年，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在修复这座濒临倒塌的佛塔时，发现了大量的西夏佛画、泥塑佛像、西夏文佛经雕版残块和琉璃建筑残件。所出的西夏文木简从释文来看是佛教徒修塔募捐用的，该木简1996年经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为一级品。汉文绢质发愿幡带出土时中部打一活结，它的出土说明了在西夏境内，西夏字在作为国字广泛流行的同时，其他民族的文字诸如汉文也在使用。另有西夏文书残页两件，发现时均粘于一块不规则的泥块上，其中一件为《番汉合时掌中珠》中的一页，经专家研究，此为西夏人骨勒茂才编印的《番汉合时掌

中珠》第4页第6栏残页。另一件残页上存有4个完整的西夏文字，内容尚待辨识。

（二）文物的价值

宁夏博物馆所藏西夏文献，就时代而言，不仅有西夏时期的，也有元代的，内容多为藏传佛教佛经，反映出这一时期藏传佛教在宁夏所属范围的流行情况及其特点。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西夏文佛经和藏文咒语，在宁夏的108塔、同心县康济寺塔、贺兰县的宏佛塔、拜寺口双塔、拜寺沟方塔和西夏故地的河西、内蒙古等地均有发现，所有这些发现，其题材、内容、艺术风格、制作方法，都具有西夏至蒙元时期的时代特征。

（三）学术的价值

通过对馆藏各类西夏文献的研究，我们可以大体看出西夏文化的整体风貌，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汉族传统的文化在这里得以继承和发展

西夏是一个以党项羌为主体的国家，其境内还有众多的汉、回鹘及吐蕃等民族。早在西夏建国之前，党项羌曾经历了两次历史大迁徙，深入到汉族地区，与汉人杂居，在长期的相互往来中，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即唐宋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建国后，其典章制度多采自宋朝，所谓“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马，行中国法令”。在绘画、建筑、书法篆刻等诸多方面无不带有中原文化的烙印。

2. 积极倡导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

党项和吐蕃两个民族历史上渊源较近，地域相接，山水相连，宋人称“大约党项吐蕃，风俗相类”。西夏政权本身也带有很浓厚的吐蕃文化的色彩。公元11世纪，藏传佛教经河西走廊进入西夏。12世纪以后，西夏乾顺与青唐联姻，更打通了西夏与吐蕃腹地的联系，因此仁孝时藏传佛教各派高僧纷纷北上，使得藏传佛教得以在西夏广泛传播。在宁夏地区宏佛塔、拜寺口双塔和青铜峡108塔出土的藏传唐卡，以及拜寺沟方塔出土的有关藏传佛教内容的佛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3. 努力突出本民族的特色

尽管党项羌在由游牧文化向农耕文化转变，但作为母体文化的主要部分仍然是其基本内核。最能代表西夏文化特点的是西夏文字的创制，它对于形成、保存和发展西夏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本次收录的西夏文献有数十件组，其中纸质文献七件册、西夏文本简一件以及金属器数件。我馆收藏的西夏陵出土的石碑石刻另由西夏博物馆编撰，统一收录在《金石编》内。（李进增 王效军）

四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卷综述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珍藏西夏文献是本所工作人员在西夏方塔中发掘出土的。方塔是坐落于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深处的一座西夏密檐式砖塔，1990年11月被不法分子炸毁，成为废墟。1991年8月至9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清理发掘，出土了一批珍贵的西夏文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30多种西夏文献，是建国以来出土西夏文献最多的一次。下面对其作简要综述。

（一）数量和种类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藏方塔出土西夏文献有30多种，400多个页面。其中有完本，也有残页；有西夏文，也有汉文；有写本，也有雕版印本和木活字印本；有佛经、发愿文，也有世俗文献。文献品种多，内涵极为丰富。

1. 西夏文文献

- （1）《吉祥遍至口合本续》卷3、4、5。
- （2）《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之要文》1卷。
- （3）《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之广义文》下半。
- （4）《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之解生喜解补》卷1、2、3、5。

(5) 佛经长卷。

(6) 经咒。

2. 汉文文献

(1) 《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略疏》卷下。

(2) 《佛顶心陀罗尼经》。

(3) 《圣妙吉祥真实名经》。

(4) 三十五佛名礼忏功德文·附仁宗施经发愿文。

(5) 《圆觉道场礼忏一本》。

(6) 《吉祥上乐轮略文等虚空本续》。

(7) 异本救诸众生一切苦难经。

(8) 修持仪轨。

(9) 众经集要·《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

(10) 众经集要·《佛说无量寿经》。

(11) 众经集要·《佛说观无量寿经》。

(12) 众经集要·《佛说阿弥陀经》。

(13) 众经集要·《佛说称扬诸佛功德经》。

(14) 众经集要·《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

(15) 众经集要·《大方广佛华严经》。

(16) 佚名“诗集”。

3. 佛画

(1) 顶髻尊胜佛母像。

(2) 捺印佛像。

(二) 文献价值

宁夏方塔所出西夏文献距今已有八九百年的历史，皆属善本之列。现存的宋版书均为珍稀文献，西夏文献与宋朝同时期，而且用西夏文字印成，文物价值很高，十分宝贵。

1. 文物价值

这批文献中有不少在海内外已知西夏文献中属孤本。如佚名“诗集”、《吉祥遍至口合本续》《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之要文》《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之广义文》《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之解生喜解补》《吉祥上乐轮略文等虚空本续》，“修持仪轨”等。国内外现存西夏文献中，国外主要收藏于俄罗斯、英国、日本等国，国内主要收藏在北京、宁夏、甘肃、内蒙古、陕西等省市的图书馆、博物馆和考古所等部门，在这些文献中未见上述文献。这些孤本为西夏文献增加了新的品种和内容。

宁夏考古研究所所藏西夏文献多为佛教内容，是研究西夏佛教派别和民间信仰的重要资料。写本《圆觉道场礼忏》是一种华严宗所设的修行忏法，《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略疏》是华严宗的重要经典。这两种佛经的发现，为华严宗在西夏的盛行找到了新的依据。“众经集要”是由摘录《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佛说观无量寿经》《佛说无量寿经》《佛说阿弥陀经》《佛说称扬诸佛功德经》《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中关于净土的论述编辑而成，说明净土信仰在西夏非常流行。《佛顶心陀罗尼经》是研究观世音信仰的重要资料，也是我国重要的疑伪经之一，证明观世音信仰在西夏亦较盛行。“异本救诸众生一切苦难经”是与《救诸众生一切苦难经》等同类的民间传帖，是研究西夏民间信仰的重要材料。“三十五佛名礼忏功德文·附仁宗施经发愿文”，雕印于西夏仁宗乾祐十一年(1180年)此发愿文表明在西夏时期“三十五佛名礼忏法”亦非常流行。

汉文佚名“诗集”多为七律，共有 75 首，内容主要描写自然山水、风花雪月、四季节日等，其中保存有诗名的近 60 首。作为传统的古诗集，在西夏文献中还是第一次发现，填补了西夏文献的空白。“诗集”中有《人日》《上元》《打春》《重阳》《冬至》等节日，说明西夏的民俗与中原地区有相同之处。诗集丰富的内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夏的社会情况和人文精神。

版印顶髻尊胜佛母像、朱红捺印释迦牟尼佛像，是珍稀西夏佛教文物，为研究西夏的版刻艺术提供了新的资料。顶髻尊胜佛母像，在上下不到7厘米、左右不到6厘米的范围内刻佛母结跏趺坐像，饰头光，背光，三面八臂，八手各持不同法器，造型丰富，形象逼真，充分反映了西夏刻工雕版技术之高超。

西夏文佛经长卷，长5.7米，全篇草书，甚难辨认，但其字体笔法流畅，书写随意，整篇文章层次分明，段落清晰，是罕见的一件西夏文佛经文献。

在这一批文献的纸张检测中，发现有棉花纤维，说明西夏王朝已经开始种植棉花。棉花的种植和使用，在中原地区是晚自元代才开始的。而在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藏的文献纸张的检测分析中，其成分除了麻类纤维和树皮纤维外，还有棉花纤维，这一发现为西夏种植棉花提供了新的宝贵证据。

2. 研究藏传佛教的价值

《吉祥遍至口合本续》《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之要文》《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之广义文》《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之解生喜解补》《吉祥上乐轮略文等虚空本续》、“修持仪轨”等均是译自藏文的藏传佛教密宗文献，在研究西夏的藏传佛教方面有重要价值。

《吉祥遍至口合本续》诸经可能是藏文本的唯一传本。《吉祥遍至口合本续》每卷前均有相同的藏文译者、西夏文译者的题记，译成汉文为：“西天大班智达迦耶达啰之前面，中国^①大宝桂译师枯巴拉拶翻译，报恩利民寺院副使毗菩提福翻译”。^②此题记为探索这些佛经的成书和流传提供了重要线索。在《藏文大藏经》（北京版）中找不到与《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经名完全对应的佛经，内容与其相同的藏文佛经为《真实相应大本续》（yang dag par sbyor ba zhes bya bavi rgyud chen po）^③。但是，两种文本的译者不完全相同，西夏文本《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的译者是迦耶达啰āadhara和桂·枯巴拉拶（vgos khug pa lhas btsas），而藏文本《真实相应大本续》的译者是迦耶达啰和卓弥·释迦益西（vbrog mi shākya ye shes）。这表明在10至11世纪，两位吐蕃大译师卓弥·释迦益西和桂·枯巴拉拶均与天竺僧人迦耶达啰合作翻译过《吉祥遍至口合本续》（或名《真实相应大本续》）。但是，由于两个译本内容雷同，后人在抄录、雕印《藏文大藏经》时可能有所取舍，或者说枯巴拉拶译本在明清时期已经佚失。所以，在今天的《藏文大藏经》中只有释迦益西译本，而不见枯巴拉拶译本。《吉祥遍至口合本续》可能是枯巴拉拶藏文译本的唯一传本，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它不仅是研究西夏藏传佛教的重要材料，而且对研究藏传佛教古代译史和藏传佛教本身也有重要价值。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藏西夏文献是研究藏传佛教密法在西夏传播的重要宝库。《吉祥遍至口合本续》同样的藏文佛经在《藏文大藏经》中作《真实相应大本续》，其乃萨迦派道果法所依赖的重要怛特啰之一，萨迦派历代祖师都极为重视《真实相应大本续》。所以，《吉祥遍至口合本续》被翻译成西夏文应是与萨迦派所传播的道果法有一定关系。汉文写本“修持仪轨”是藏传密典《喜金刚本续》和《上乐根本续》的部分内容^④，《吉祥上乐轮略文等虚空本续》也与上乐金刚本尊坛城修法有关，这些文献对研究藏传佛教本尊坛城修法，特别是萨迦派的修法在西夏的传播有着重要意义。

3. 印刷史、版本学研究的价值

《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等9册的西夏文佛经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印本之一。这些佛经共有的印刷特点是：版框栏线四角不衔接，留有大小不等的空隙；墨色浓淡不匀，纸背透墨深浅有别；字体笔法风格各异；个别经页版心行线漏排，有的最后一页不设栏线或栏线放在经页中间文字之后；有倒字现象；字行间有隔行夹片印痕等。这些现象均体现了木活字印本的特点^⑤。《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等西夏文佛经于1996年11月被文化部科技司组织专家鉴定，认为其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实物，它对

① “中国”为西夏文直译，也可译为“中土”，其既不是指中原王朝，也不是指中天竺。见史金波：《西夏佛教新探》，《宁夏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西夏文“中国”一词系译自藏文，或是藏文dbus vgyur（中土）之对译，即佛教徒所说的正统佛教流行之中心。

② 孙昌盛：《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合本续〉题记译考》，《西藏研究》2004年第2期。

③ 《藏文大藏经》秘密部第3卷，第26号，第245~280页。此经系日本京都结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的沈卫荣教授在《藏文大藏经》中检出。承蒙沈先生惠赐藏文本复印件，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④ 谢继胜：《西夏唐卡中的双身图像与年代分析》，《艺术史研究》2000年第2辑。

⑤ 牛达生：《我国最早的木活字印本——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中国印刷》1994年第2期。

研究中国印刷史(特别是活字印刷史)和古代印刷技术具有重大价值”,其重要价值在于修正了长期以来认为木活字为元代科学家王祯“发明”的说法,将我国木活字印刷技术提早一个朝代;同时也为我国早期活字印刷技艺提供了新的资料,说明王祯《活字印书法》中造字、排版、印刷的工艺流程,早在西夏时期就已出现;也证明了在活字印刷技术由中原向西方传播过程中,西夏起了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等文献将西夏文化、吐蕃文化和中原文化结合在一起,是我国古代各族人民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共同进步的历史见证。

汉文写本佚名“诗集”“修持仪轨”“众经集要”是早期的线装本。这3种文献的共同特点是在每页的中缝折线处均有3个订孔,出土时仍有订缀的线绳,说明它们曾是用线订缀在一起,应属早期的线装书。一般说法,线装书是产生于明朝中叶。但是,专家们经过对敦煌遗书的研究,认为线装书起源于唐末宋初,盛于明清^①。而西夏的佚名“诗集”“修持仪轨”“众经集要”等文献证明西夏王朝亦曾使用线来装订书册。

宁夏考古所所藏文献多为印本,且大多保存完好。这些印本文字工整秀美,墨色清晰,行格疏朗,纸质优良,是我国古代优秀版本。如《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略疏》的经文与疏文分别用黑地白文与白地黑文镌刻,在早期刻本中极为罕见,是珍贵的早期雕版印本实物。

此外,这些文献对西夏的纸张、书法研究也有重要价值。

(三) 文献级别

《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等9册西夏文木活字印本佛经、西夏文佛经长卷、汉文三十五佛名礼忏功德文·附仁宗施经发愿文和顶髻尊胜佛母像版画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2001年8月,国家文物局又将《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等9册佛经列入第一批国家禁止出境的26种文物之一;2002年3月,国家档案局又将其列入第1册“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48种文献之一。

(罗 丰 孙昌盛)

五 罗雪樵藏卷综述

罗雪樵(1903~1986年),甘肃会宁人,银川一中语文教员,学识广博,长书法,精篆刻,曾任银川市政协委员,为宁夏书法协会顾问、宁夏文史馆馆员。罗先生酷爱西夏文化,刻意搜集西夏文物,并潜心学习、研究西夏文字。1917年宁夏灵武县知事余鼎铭修城时,获西夏文献甚多。其中大部分文献于1929年运至北京,入藏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另一部分文献分别为私人收藏,部分流失日本。1947年雪樵先生自一灵武人手中购得3本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即来源上述出土旧物。

1976年我和白滨到陕西、宁夏、甘肃、内蒙古考察西夏文物、搜集西夏资料时,在银川工作期间曾拜访雪樵先生,当时在宁夏博物馆工作的吴峰云同志陪同前往。年逾古稀的雪樵先生热情地接待我们。先生精神矍铄,学识渊博,谦逊质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罗先生向我们展示了他珍藏的多件西夏瓷器和两卷西夏文佛经。承蒙先生善意,让我们拍摄了部分瓷器和西夏文佛经。我们也应雪樵先生之要求,为他提供了当时在银川难以见到的西夏学资料。此事虽已过去近30年,当时与罗先生切磋学术、交流资料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此次联络国内各省市集结出版《中国藏西夏文献》,将先生所藏西夏文经印制出版,当亦符合已故雪樵先生交流西夏资料、推动西夏研究之愿望。

雪樵先生撰写《关于宁夏境内出土发现的西夏文物》^②,其中包括雪樵先生所藏西夏文佛经。罗藏西夏文佛经包括木活字本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卷26、卷57,其来源同国家图书馆所藏该经文物、学术、版本价值相同。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木活字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很多,共63卷,但欠缺卷26,仅存该卷封面。罗藏本正好能补足所缺,可称海内外孤本。国家图书馆有该经卷57,存66面,有缺失,第1面后缺2面,卷末残,而罗藏本虽也非完本,存58面,但可与国家图书馆藏卷相互补充,得成完璧。可见罗藏本有其特殊价值。

罗藏本两卷佛经不仅有部分残缺,其中有的还在折面处断裂,形成页面前后错乱,难以连贯,甚至两

① 李致忠:《古代梵夹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的起源和流变》,《图书馆学通讯》1987年第2期。

② 徐梦麟主编:《宁夏文史选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

卷也有交叉误置。今于出版之际，重新整理，核对经文，缀连拼合，理清顺序，以便读者使用。（史金波）

六 敦煌研究院藏卷综述

据历史文献记载，西夏曾统治瓜、沙二州——即今甘肃省敦煌市、安西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等地长达近两个世纪，在这些地区留下了许多西夏时期的遗迹和遗物。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安西东千佛洞、肃北五个庙等石窟群，不仅至今仍保存有西夏时期开凿或重修的洞窟和西夏时期绘制的壁画^①，以及在这些洞窟内书写的西夏时期的题记^②，还先后数次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西夏文文献。尤其是近年来在莫高窟北区出土的一批西夏文文献，至为重要，其中有的文献属于世界孤本，有的文献为国内所仅存，这些新发现成为莫高窟历次发现西夏文献的新亮点而为西夏学界所瞩目。此外，在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文物库房还收藏有部分西夏文文献。

为使读者全面了解敦煌研究院藏西夏文文献的概况，现将这些院藏西夏文文献发现经过、数量、种类、内容、价值、收藏以及整理沿革作简略介绍。

（一）敦煌莫高窟西夏文文献发现的时间和经过

迄今为止，在敦煌莫高窟已先后数次发现西夏文文献。发现的时间和具体经过如下：

第一，1908年在莫高窟北区首次发现了西夏文文献：当年精通中文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到了敦煌莫高窟，对藏经洞的洞窟进行编号，绘制洞窟立面图和平面图，拍摄洞窟壁画和塑像，抄录洞窟中的汉文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字题记，还利用当年住在莫高窟下寺的王道士的无知进入藏经洞，将该洞窟内当时所收藏的文献和艺术品翻阅一遍，并把其中6000余件文献精华、200多幅绘画、20余件木雕、一大批绢幡、经卷以及各类织品廉价购走，运回法国，现分别收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和集美博物馆。不仅如此，伯希和还涉足莫高窟北区洞窟，对由他编号的P.181号洞（即今第464窟）和P.182号洞（即今第465窟）进行了盗掘，盗掘大量的文物，仅文献就有3大箱，其中西夏文文献就有200件。这是见于记载的莫高窟首次发现西夏文文献。伯希和在莫高窟北区盗掘的西夏文文献现收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③。

第二，20世纪40年代初，莫高窟发现西夏文文献：著名画家张大千先生于1941年至1943年间，两次停留于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在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为洞窟进行编号，临摹洞窟壁画数百幅，为弘扬敦煌艺术、呼吁在莫高窟设立管理机构、保护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作出了很大贡献。然而，在肯定大千先生功绩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指出，他在莫高窟临摹壁画期间，曾指使他人对北区洞窟进行了乱挖乱掘，从而给莫高窟佛教寺院考古学研究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张大千先生在莫高窟北区洞窟中的挖掘，所获亦很丰富。其中就有一批西夏文文献。这是莫高窟北区第二次发现西夏文文献。但具体数量至今仍不得其详。因这批出自莫高窟北区的西夏文文献等，亦于半个世纪前流失域外，现分别收藏于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④。

第三，1959年莫高窟第三次发现西夏文文献：当年三月，敦煌研究院的前身敦煌文物研究所对大泉河东岸的元代舍利塔进行维修、加固时，发现了西夏文佛经《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等。这些西夏文佛经现藏于敦煌研究院^⑤。

第四，1988年至1995年期间莫高窟第四次发现西夏文文献：莫高窟北区洞窟是指开凿于莫高窟第一

①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1996年；王静如：《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所见的西夏历史和文化》，《文物》1974年第5期；刘玉权：《再论西夏据瓜沙的时间及其相关问题》，《敦煌研究》1993年第4期；刘玉权：《略论西夏壁画艺术》，《西夏文物》第9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② 史金波，白滨：《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研究》，《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③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前言，文物出版社，2000年；森安孝夫：《回鹘语文献》，《讲座敦煌·6·敦煌胡语文献》第9页及第95页追记，（东京）大东出版社，1985年。

④ 王三庆：《日本天理大学天理图书馆典藏之敦煌写卷》，《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91年，第79页；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8页；彭金章：《讲学·参观·寻宝——赴美讲学纪略》，《丝绸之路》2001年第3期。

⑤ 刘玉权：《本所藏图解本西夏文〈观音经〉版画初探》，《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史金波，白滨，吴峰云：《西夏文物》图版375，文物出版社，1988年。

窟以北崖面上的洞窟。这些洞窟数量有多少？其性质与功能是什么？北区洞窟与南区洞窟的关系是什么？曾长期困扰学术界而不得其解。为了揭开蒙在莫高窟北区洞窟上的神秘面纱，探索北区洞窟之谜，在经过报请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文物局批准，敦煌研究院组织考古研究所考古专业人员对北区洞窟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并取得了丰富的收获。其中出土了大批西夏文文献。这批文献现收藏于敦煌研究院^①。

第五，莫高窟南区第 476 号窟出土的西夏文残片：为配合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对藏经洞所在的莫高窟三层楼的维修工程，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考古专业人员于 2002 年 7 月对位于三层楼内、藏经洞之上的第 476 号窟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遗物，其中有一件西夏文文献残片^②。

第六，除上述几次有案可查的西夏文文献发现外，敦煌研究院还收藏有据说是出自元代塑像的一件西夏文佛经。以及原由周炳南收藏的“敦煌石室遗墨一百二十五种续编”中的西夏文文献残片，由辛普德收藏的“历代写经残片集锦”中的西夏文文献残片，钤有“任子宜”朱印的西夏文文献残片等。均是收购所得。

（二）莫高窟北区洞窟新发现的西夏文文献的数量、种类和内容

由于莫高窟第一、二次发现的西夏文文献早年已流失国外，为别国所收藏，故它们的数量、种类、内容均不详，如由日本和美国所收藏的原张大千所获西夏文文献；有的数量虽清楚，但其种类和内容则不详，如法国所收藏的由伯希和在莫高窟北区所盗掘的西夏文文献。所以在这里仅就莫高窟北区洞窟此次新发现的西夏文文献和敦煌研究院收藏的西夏文文献的数量、种类和内容作一介绍。

1. 数量和种类

（1）数量：莫高窟北区洞窟此次共出土纸本西夏文文献有 126 件^③，西夏时期的纸本汉文文献 1 件。除此之外，还发现了非纸本的文字类文物，如发现了汉文西夏钱币“天盛元宝”12 枚和“乾祐元宝”16 枚，西夏文大型木印章 1 方，葫芦片上雕刻的一西夏文字，西夏文木牍 1 枚，以及数百件（片）无头无尾的西夏文文献残片。敦煌研究院收藏的西夏文文献有 47 件。莫高窟第 476 号窟新近出土西夏文文献 1 件。以上诸项合计，敦煌研究院现收藏西夏文文献共计 174 件，西夏时期的汉文文献 1 件，西夏钱币 28 枚，西夏印章 1 方，葫芦片上刻西夏字 1 枚，西夏文木牍 1 枚。

（2）种类：敦煌研究院所收藏的西夏文文献种类可分为社会文献和宗教文献。

社会文献：虽均为残页、残片，但有的价值很高。具体有：

- ①《碎金》。
- ②《三才杂字》。
- ③《番汉合时掌中珠》。
- ④ 帐籍。
- ⑤ 僧人职事名单。
- ⑥ 十相自在图。
- ⑦ 诗词。
- ⑧ 汉文契约。

此外还有一批名称不详的社会文献。

宗教文献：既有佛教文献，又有道教文献。其中佛教文献有：

- ①《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
- ②《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
- ③《诸密咒要语》。
- ④《地藏菩萨本愿经》。
- ⑤《龙树菩萨为禅陀迦王说法要偈》。
- ⑥《大方广佛华严经》卷 2。

①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 1、2、3 卷，文物出版社，2000 年、2004 年；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文献初探》，《敦煌研究》2000 年第 3 期。

② 张小刚，王建军：《莫高窟第四百七十六窟考古清理报告》，《敦煌研究》2004 年第 3 期。

③ 此数字与《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 2 卷结语（中）的统计数略有出入，原因是增加了一些残存西夏文较多的残片。

- ⑦《金光明最胜王经》卷5。
- ⑧《高王观世音经》。
- ⑨《千佛经》。
- ⑩《无量寿经》。
- ⑪《般若部类佛经》。
- ⑫《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 ⑬《种咒王阴大孔雀明王经》。
- ⑭《佛教咒语》。

此外还有大量佛教文献残片以及1件道教文献。

（三）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

莫高窟北区新发现的西夏文文献虽多为残页、残片，但其中也不乏精品。

1. 西夏文文献《碎金》：由西夏宣徽正息齐文智编，约成书于公元12世纪以前的西夏文文献《碎金》，是一部类似中原地区汉文《千字文》体的速成识读西夏文的启蒙用书。该书为研究西夏的社会、民族、习俗、文学、官制等等方面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该书的两种版本，于1909年在中国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出土后，被俄国探险队劫往圣彼得堡，现收藏于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此次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此文献的残页，填补了《碎金》在国内的空白^①。

2. 西夏文文献《三才杂字》：西夏文《三才杂字》是在西夏流行较广的一部用于启蒙教育的“字书”。保存相对完整的西夏文《三才杂字》的4种版本曾在黑水城遗址出土后被劫往俄国，现收藏于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其中一本有序言。此后，虽说1972年在中国甘肃武威出土了刻本西夏文《三才杂字》，却未发现序言^②。此次在莫高窟北区出土了国内仅有的有序言的《三才杂字》残页，其价值不言而喻。

3. 双语、双解辞典《番汉合时掌中珠》：《番汉合时掌中珠》是西夏乾祐二十一年（1190年）党项人骨勒茂才编撰的。作者在该书序言中阐明了写作的目的：“今时人者，番汉语言可以自备，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者，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该书“不仅是西夏时期学习语言、文字的重要工具书，在西夏文献湮没数百年，西夏文字成为无人可识的死文字后，又成了现代西夏学专家们识读、破解西夏语言、文字的门径，又由于其中收录了很多西夏常用词语，此书也是专家们研究西夏社会的重要资料”^③。整册的《番汉合时掌中珠》曾于1909年出土于黑水城遗址，并被劫往俄国。此后几十年来，国内再未见此书。至1989年才在莫高窟北区B184号窟发现《番汉合时掌中珠》残页，现为国内所仅存，十分珍贵。

4. 西夏文《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该经又简称《金刚经》，两种西夏文刻本曾于1959年在莫高窟出土。此次出土的《金刚经》为研究《金刚经》的流传和发展提供了新的资料。

5. 西夏文刻本佛经《龙树菩萨为禅陀迦王说法要偈》：在莫高窟北区B159号窟出土了一件西夏文刻本佛经《龙树菩萨为禅陀迦王说法要偈》残页，该佛经残页经末有两行汉文“僧禄广福大师管主八施大藏经于沙州文殊舍利塔寺永远流通供养”压捺印记。在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曾先后三次发现了西夏文佛经残页上有压捺汉文施经愿文印记：一次是1908年伯希和在P.181号洞（即今第464号窟）掘获的西夏文佛经残页上有两行汉文压捺印记，其内容与形式与B159号窟所出管主八施经愿文完全相同。该西夏文佛经现收藏于巴黎国立法国图书馆东洋写本部^④。另一次是20世纪40年代初，国人张大千指使他人任意挖掘北区洞窟所获一西夏文佛经残页上，有两行压捺的汉文施经愿文印记，其内容与形式与B159号窟所出管

① 聂鸿音，史金波：《西夏文本〈碎金〉研究》，《宁夏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② 聂鸿音，史金波：《西夏文〈三才杂字〉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

③ 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文献初探》，《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史金波：《西夏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

④ 森安孝夫：《回鹘语文献》，《讲座敦煌·6·敦煌胡语文献》第9页及第95页追记，（东京）大东出版社，1985年；又见罗振玉：《沙州文录》；王国维：《观堂集林》第21卷。

主八施经愿文完全相同。该西夏文佛经残页现藏于日本天理图书馆^①。

据日本善福寺所藏《磧砂藏》本《大宗地玄文本论》卷3记载：“钦睹圣旨，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刊河西字大藏经三千六百二十余卷，华严诸经杆板，至大德六年完备。管主八钦此胜缘，印造三十余藏及《华严大经》《梁皇宝忏》《华严道场忏仪》各百余部，《焰口施食仪轨》千有余部，施于宁夏、永昌等路寺院，永远流通。”^②宁夏、永昌均为西夏故地，曾发现大量西夏文文献，但未发现其上有汉文施经愿文押捺印记。然而，在《大宗地玄文本论》卷3记载中并未言及的沙州，却三次发现同样的施经印记，这些发现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表明，管主八不仅施大藏经于宁夏、永昌等路，还施大藏经于沙州路。这些佛经无疑是当年广福大师管主八施30余藏河西字大藏经的一部分。这样的印记虽三次发现于莫高窟北区，但前两次发现的实物早已流失域外，由别国收藏，仅有1989年于莫高窟北区B159号窟发现的残页现存国内。因而该佛经也就成了国内唯一有押捺汉文广福大师管主八施经愿文的西夏文大藏经的孤本，故为学术界所瞩目。

在莫高窟北区洞窟还出土了刻本《种咒王阴大孔雀明王经》。据学者研究，在俄藏西夏文文献中，有多种刻本和写本《种咒王阴大孔雀明王经》。但在国内，却以莫高窟此次发现的《种咒王阴大孔雀明王经》为仅存的版本。

在敦煌研究院所藏西夏文刻本《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栏内上部四分之一空间为木刻图画。内容为《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中的种种情节，共55幅，每幅图画是下面经文的图解。这是目前所知现存最早的佛教连环画之一。它的出土，“为考察研究西夏佛教译经史和西夏雕版印刷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对于考察研究西夏时期的版画艺术，更是珍贵资料。另外，该经数十幅连环式版画中许多世俗人物形象，对于研究西夏时期的衣冠服饰、发式以及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也是理想的参考材料”^③，因而具有其珍贵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四）版本价值

敦煌研究院收藏的西夏文文献中，既有手抄本，又有木刻本，还有活字印刷本。尤其是在莫高窟北区新近出土了多件活字印刷的西夏文文献，增加了中国早期活字印刷的实物标本。在这些活字印刷品中，又以《地藏菩萨本愿经》和《诸密咒要语》最为珍贵。到目前为止，在西夏故地已发现多种西夏文活字印刷文献，但“在其他地区发现的西夏文活字印刷品中还没有《地藏菩萨本愿经》”^④。因此，莫高窟北区洞窟新发现的《地藏菩萨本愿经》也就成了海内孤本而为学术界所重视。这一发现，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莫高窟北区发现的活字本《诸密咒要语》是另一部重要西夏文佛经，其珍贵之处在于该文献为海内孤本。故不论其学术价值和版本价值均十分重要。

中国是最早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国家。这一伟大发明，是中国对世界文明作出的杰出贡献。宋代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不久，此项先进印刷技术很快就传播到与宋比邻的西夏王朝。近年来，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甘肃武威、宁夏银川等西夏故地先后发现了一大批西夏文献，其中就有不少属于活字印刷品^⑤。据统计，迄今为止，累计已发现了用活字印刷的西夏文文献有十几种^⑥。现在又在西夏当年统治的另一个地区敦煌发现了多件西夏文活字印刷品，说明西夏王国使用活字印刷术已很广泛。包括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发现的多种西夏时期的活字印刷品，都是当今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活字印刷品实物。西夏的活字印刷实践，为这一先进印刷技术的完善和早期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考虑到在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先后发现了1152枚回鹘文木活字，故推测西夏、元代时期的敦煌可能是一处活字印刷中心。由此可知，敦煌在中国活字印

① 王三庆：《日本天理大学天理图书馆典藏之敦煌写卷》，《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91年，第79页；大庭修：《敦煌发现の张君义文书について》，《ビブリア》第20号，1986年，图版1，第2~13页。

② 宿白：《元代杭州的藏传佛教及其有关遗址》，《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13页。

③ 刘玉权：《本所藏图解本西夏文〈观音经〉版画初探》，《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史金波，白滨，吴峰云：《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8年，图版375。

④ 史金波：《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西夏活字印本考》，《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1期。

⑤ 史金波，雅森·吾守尔：《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8页。

⑥ 史金波，雅森·吾守尔：《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8页。

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①。

（五）整理沿革

敦煌研究院藏西夏文文献由于来源不同，因而对其进行整理、研究的情况也就各不相同。

莫高窟北区洞窟新出土的 128 件西夏文文献，是近年来经过科学考古发现的，虽绝大部分为残页、残片，但通过敦煌研究院的文物修复专家李云鹤研究员以及何明阳先生的精心修复，才得以使这批被埋藏了六七百年的珍贵西夏文献、文物得以重现人间。后经过史金波教授深入细致地研究，发现其中有的西夏文献属于国内所仅有，而有的西夏文献则为世界孤本，故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物价值、学术价值。有的文献还具有珍贵的版本价值^②。

敦煌研究院收藏的西夏文献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敦煌文物研究所在窟区内发现的。其中，1959 年发现于大泉河东岸元代舍利塔的西夏文佛经《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业经刘玉权先生和陈炳应先生研究，其研究成果已发表^③。西夏文《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于 1964 年业经王静如先生和史金波教授整理和研究。其中西夏文佛经《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曾多次在国内外展出，深受国内外参观者的欢迎，对于世人了解敦煌、了解西夏、了解中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另外还有一件知名度不详的西夏文佛经是在元代塑像中发现的，保存欠佳，其内容有待研究。

在敦煌研究院藏的收购品中，有一本已装订成册的“敦煌石室遗墨一百二十五种续编”，并盖有“周炳南印”记。涉及的内容除西夏文文献残片外，还有汉文、回鹘文文献残片等。周炳南其人，曾出任驻敦煌的肃州巡防第四营统领，此人曾于 1922 年命营部司书会同敦煌县警察署对莫高窟洞窟进行清查编号，共计编了 353 个洞窟号，此次编号后作为陈万里撰《西行日记》附录发表。盖有“周炳南印”记的“敦煌石室遗墨一百二十五种续编”中粘贴的西夏文、汉文、回鹘文文献，与新近北区洞窟出土的同类文献极其相似，据此推测，盖有“周炳南印”记的文献册或许也来自莫高窟北区洞窟。至于辛普德收藏的“历代写经残片集锦”中的西夏文文献残片，以及钤有“任子宜”朱印的西夏文文献残片等，只知系收购所得，但具体情况已无法得知。

（彭金章）

七 甘肃省博物馆藏卷综述

甘肃省博物馆所藏西夏文献文物，系多次入藏，有相当数量，且价值很高，有些文献甚至是国内外西夏藏品中的“唯一”或罕见珍品，值得推介。

（一）世俗文献

主要出土于武威张义小西沟峽西夏修行洞。1972 年 1 月，甘肃省武威县张义公社的农民在山区小西沟峽采中药五灵脂时，发现了近百件西夏文物文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发现的第一个西夏遗址和第二批珍贵的西夏文物，包括世俗文献，生产生活用品和佛教典籍、文物^④。世俗文献中有官府文书、会款单、欠款条、占卜辞、历日、医方和蒙书《杂字》等，都是国内罕见的西夏文献，对研究西夏社会历史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1. 官府文书

有 8 件，其中汉文 5 件、西夏文 3 件。例如：有一件下级给上级的布告（残），墨书汉文行书体：“……者……右谨具申……西路乐府口勾官所……光定二年九月日监乐官府……监乐官府……礼。”虽然只存一

① 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区西夏文文献译释研究》（1）、（2）、（3），《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 1 卷第 371 页、第 2 卷第 369 页、第 3 卷第 420 页，文物出版社，2000 年、2004 年。

② 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文献初探》，《敦煌研究》2000 年第 3 期；史金波：《西夏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 年；史金波，雅森·吾守尔：《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第 38 页；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区西夏文文献译释研究》（1）、（2）、（3），《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 1 卷第 371 页、第 2 卷第 369 页、第 3 卷第 420 页，文物出版社，2000 年、2004 年。

③ 刘玉权：《本所藏图解本西夏文〈观音经〉版画初探》，《敦煌研究》1985 年，第 3 期；史金波，白滨，吴峰云：《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8 年，图版 375；另见陈炳应：《图解本西夏文〈观音经〉译释》，《敦煌研究》1985 年，第 3 期。

④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发现一批西夏遗物》，《考古》1974 年第 3 期。

二十个字，但有明确纪年“光定二年”，即公元1212年，是西夏第八位皇帝夏神宗的年号之一；特别是文书中提到“西路”“乐府口勾官所”“监乐官”等，都是史籍缺载的，对研究西夏的行政建制、官制和音乐制度等都很重要。

有一件请假条（两残片），墨书汉文行书体，残存的内容文字是：“今申本卡先差司吏高践苟一名本人告称或有……遣及诸处驱赶请假今日下见……”“患伤寒行履不能本卡并无□□手力不……乐人……惜……文目行送之……。”其中，“卡”的建制，史籍罕见；“伤寒”病的名称及其症状对考定出土的西夏文医方有参考价值；请假条更是国内外西夏藏品中极为罕见的。

2. 会款单和欠款条

会款单为墨书行草体西夏文，内容是：天庆虎年正月七五日，有十位西夏人聚会，各交五十钱或一百钱、一百五十钱，共计七百五十钱，“入于众钱中”。从“入于众钱中”一句推测，可能是民间互助会性质，平时大家凑份子，谁有困难，可从会中获得帮助。此会款单时代明确，是天庆虎年（1194年），为夏桓宗统治时期，距离西夏亡国只有三十几年。

欠款条是墨写行书体汉文，残存两行：“李伴初欠钱叁吊伍佰文”，“刘的的欠钱贰吊贰佰伍拾文。”

上述的会款和借钱，都是民间行为，但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从会款单十个人的姓氏看，有八位是西夏主体民族党项人，两位是其他少数民族之人。而欠款条中借款人的姓名则显示他们是汉人，说明当时这里为多民族聚居区。其二，当地互助、借贷，使用钱币，而非实物，说明当时武威地区货币经济比较发达，这与其所处丝绸之路要道，商品经济发达密切相关。这在西夏时期的凉州感通塔碑的碑铭中也有相应记载：“况武威当四衢地，车辙马复，辐辏交会，日有千数。”《马可·波罗行纪》记载：凉州“居民是商贾工匠”。

3. 占卜辞

两件，都是墨书西夏文行草书体。译文分别是：“卯日遇亲人，辰日买卖吉，巳日□□□，午日求财顺，未日出行恶，申日万事吉，酉日遇于贼，戌日有倍利，亥日有喜事……月□□□吉日。”“寅日后变甲时安，巳后日变□时安，申后日变庚时安，亥后日变壬时安，月日长星……五……月……土……”西夏主体民族党项羌人原来信奉原始宗教，其占卜方法也是原始性质，别具特色。据《辽史·西夏外纪》记载：其占卜方法主要有四种：“勃焦”“擗算”“咒羊”“矢击弦”，用艾草熏羊胛骨，劈竹算数，剖羊视肠胃，击弓弦听音以占卜吉凶胜负。此外，党项人还有“野立卜石念秘咒”的石卜，根据乌鸦叫声占卜的鸟卜，根据星象和云彩颜色占卜的星云卜等^①。后来，汉族的占卜方法也传入西夏，成为西夏人重要的占卜方法，西夏人自己也撰写了《周易卜筮断》等书。上述两件占卜辞就是汉族占卜方法的体现，它是我国传统的干支纪日法和推算法的运用，不同于党项人原始占卜法。这两件占卜辞的价值还在于它有助于研究西夏社会的某些问题。如第一件残存八日的卜辞，其中求财的就占三日，其他事项的各只占一日，可见西夏人重视经商、发财和“以富为贵，以贫为丑”的心理。

4. 历日

表格式，墨书汉文楷书体，残存七个月（七行）的上截部分六栏。根据每月的大小和朔日干支，可以推断出这是西夏人庆乙丑二年（1145年）的历日。

党项人原来只是“候草木以记岁时”，北周时开始传入中原历法知识^②。此后，中央王朝的历日和推算技术传播于党项人和西夏王国，西夏人也逐渐掌握了天文历法知识。武威出土的这件历日中，二十四节气的名称、配置，闰月和干支的用法等，都是我国传统历法的运用，应是宋朝颁赐的历日。历日中各月标出星宿的不同，应是标明太阳周年运动所经过的天区和星宿站点的不同，对于研究当时的天文知识有重要参考价值。

5. 医方

墨写西夏文行书体，残存八行，包括汤药、丸药和单味药用植物三种药方，都是治疗伤寒和寒气病的。汤药厚罗辛麻汤，是用中草药厚朴、罗勒、细辛、麻黄煎制。其中，厚朴、罗勒是芳香化湿药；细辛、

①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陈炳应：《西夏谚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② 陈炳应：《西夏探古》，《武威历史文化丛书》之一，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

麻黄是辛温解表药，放在一起，主要用于治疗寒湿症，起化湿、祛风寒、行气导滞、平喘止痛的作用。中医认为，这个医方主要是治疗因体质差、不注意饮食卫生、又患感冒而引起的肠胃寒湿症的。丸药所用的牛膝，也是用于治寒湿症的。而茺蔚子的功效是温中散寒，止泻止痛。用于治寒湿症也是适宜的。单味药用植物花椒皮，有温中止痛作用，可用于治胃寒、心腹冷痛、肢节疼痛，是既容易找到，又省钱方便的大众化医方。

这3种医方和因伤寒而请假的请假条，说明寒湿症是武威当时的常见病、多发病。中医研究出多种医方来治疗这种病，以适应不同病人的治疗需要，同时也说明我国传统医学已在西夏人中发挥主导作用，使西夏的医药卫生事业有了巨大的进步，因为党项羌人原来无医药知识，人生病，认为是魔鬼作祟，因而不吃药，请巫师送鬼而已，现在有病，知道请医生诊断、吃药治疗了，其医药水平已经接近中原地区了^①。

6. 蒙书《杂字》

残存两页，雕版印刷，从形式上看，每行有12个字，每2字为1组，组与组之间有间隔。但从释义和内容连贯上看，则是每4个字组成一个词组，各词组连接起来，成为一篇完整的人生叙事文。这是通过党项人一个富贵人家子弟的一生历程，用通俗易懂的讲故事方法，来宣扬西夏社会的道德规范，从而留下了反映西夏社会及西夏人精神面貌等多方面极其珍贵的资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有反映阶级关系的罕见资料，即文书中说到的“口奴仆隶，厮僮奴婢”，包括在野外劳动的奴隶和搞家务活的奴婢。

有反映党项羌人精神面貌重大变化的资料。文书中说，党项人原来从小就好胜刚勇，并以此为荣，这符合游牧民族的特性。后来儒学精神广泛传播，在社会中占了主导地位，因而党项人的思想观念也变了，要求自己的孩子懂礼貌，循规蹈矩，并请儒士担任家教老师，学习儒学。孩子一学“便通”，对下人和孤寡老人都施以仁爱。

有反映社会文化面貌的，如有喜事，则以宴请、歌舞、鼓乐庆贺。乐器有笛、鼓等。妇女怀孕，要穿宽敞的衣服。非常喜欢小孩，注重婴儿卫生等等。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罕见资料。这些文献被发现后甘肃省博物馆十分重视，1974年就在《考古》杂志上报道介绍，并引起西夏学专家的考释和讨论^②。

（二）佛教典籍

主要有4批：

1. 发现于天梯山石窟

1952年，在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窟发现一批西夏文文献。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冯国瑞将这些文献粘贴在特制的本子上，编号保存，共有35页（有的略残）。这批文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西夏文物文献的首次重要发现。经翻译、研究，始知全是佛教典籍，有墨写的发愿文、《妙法莲华经》和陀罗尼（佛教咒言）；更多的是印本佛经，即《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大般若经》《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三胜之说缘》等^③。在《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的经名之下，标有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嵬名仁孝的尊号——“奉天显道耀武宣文圣智惇睦懿恭皇帝”，但这一尊号比其他西夏文佛经刊载的仁宗尊号少了“制义去邪”和“神谋”六字^④。据《宋史·夏国传》和《西夏书事》记载：夏仁宗于宋绍兴九年（1139年）六月继位，十一年（1141年）八月，“群臣上仁孝尊号‘制义去邪’”。绍兴二十年十二月癸卯，因白虹贯日，金国皇帝诏夏仁宗去其尊号。又《金史》记载，次年九月，夏仁宗遣使至金国，表请不去尊号^⑤。可见，夏仁宗并未因宗主国金国皇帝的诏命而去掉或改变自己的尊号；又仁宗即位前三年的尊号没有“制义去邪”四字，因此可判定天梯山石窟这批西夏文佛经（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刊印的时间是公元1139年6月至1141年8月间^⑥。

① 陈炳应，石中琦：《西夏科技》，《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丛书·通史卷》，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

②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发现一批西夏遗物》，《考古》1974年第3期；王静如：《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考释》，《考古》1974年第3期；史金波：《〈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考释〉质疑》，《考古》1974年第6期。

③ 陈炳应：《天梯山石窟西夏文佛经译释》，《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3期。

④ 此尊号的全称是：“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

⑤ 《金史》卷60《交聘表》。

⑥ 陈炳应：《天梯山石窟西夏文佛经译释》，《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3期。

天梯山石窟发现的西夏文佛经有重要学术价值。如发愿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和译自藏文的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等，证明著名的武威天梯山石窟，历代香火不断，到西夏时期，同样受到高度重视，有法师级高僧住持，有党项、吐蕃、汉族、印度僧人共同生活，翻译、刊布、流传过不少西夏文、藏文、汉文、梵文佛经，应是西夏的佛教圣地之一。

西夏译经的蓝本是多元的，有汉、藏、梵文，可能还有回鹘文的。经研究，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译自藏文本，它与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同一部西夏文佛经属不同译本，如把“种咒”全部译为“明咒”。此外，与宋版书同时代的这批西夏文雕版佛经，版本大小、格式多种多样，刻工精细，文字秀美，是研究古代版本的珍贵资料。有的雕版佛经的空白处，增添了版画“小沙弥绘花供养图”，很有生活情趣，也是其他佛经上罕见的。有的专家认为《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很可能是迄今所知最早的活字印刷作品^①，值得进一步研究。

2. 发现于武威张义西夏修行洞遗址

武威县小西沟岷发现的西夏文献中还有佛教典籍，其中有雕版印刷佛经和墨书西夏文佛经。雕版印刷佛经有《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千佛名经和发愿文等。佛经中发现两个珍贵的西夏年号——“天盛”（1149~1169年），“乾祐十六年”（1185年）。而《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的纸质非常好，在地下埋藏八九百年后仍很洁白、柔软，雕版精细，书法精美，非民间印刷品可比，应是文献记载夏仁宗时一次刊印十万册的《上生经》。墨书西夏文佛经有：圣观自在菩萨说法和称颂圣观自在菩萨的偈颂，以及《文殊师利行愿经》，《妙法莲华心经》等，其中也有一个西夏年款“天盛己巳元年（1149年）七月二十日”，对这批文物的断代颇为重要。

上述佛教文献文物和大量汉文、西夏文文书的发现，说明这一地区当时有汉人、党项人、吐蕃人（藏人）等民族聚居，这里的佛事活动相当兴盛。

3. 发现于炳灵寺石窟

在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发现12件墨写行草书体的西夏文陀罗尼和1件墨写正书体藏文陀罗尼，分别写在黄麻纸和白麻纸上。它们分属于3种陀罗尼（佛教咒言），特别珍贵的是：其中的一类陀罗尼（6件），与藏文陀罗尼的内容基本上相同。因为西夏文是表意文字（或称为音意文字），又是早已不用的死文字，构拟其语音是西夏研究的重要课题。《番汉合时掌中珠》等文献中以汉字为西夏文注音，其中的汉字应是唐宋时期的西北方音，与今天的读音不尽相同，因此仅用汉字标音难以准确拟定西夏文的音读。而藏文是拼音文字，虽然其音读也有时代、地区的不同和变化，但其标音能够比较接近西夏字的音值，是研究西夏语音的重要资料。所以，当在俄罗斯所藏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献中发现西夏文、藏文对音的佛经时，被视为珍品加以研究。炳灵寺发现的西夏文、藏文对音陀罗尼，也应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初步看来，炳灵寺发现的这些西夏文、藏文对音陀罗尼，对于研究西夏语鼻韵尾的有无、强弱，同类辅音的变化，不同类辅音的通转，元音的变化等，具有重要的价值^②。

4. 发现于“破四旧”书堆中

1966至1967年文革初期“破四旧”运动中，兰州市有些单位把收缴的古书刊、书画交到甘肃省博物馆，博物馆陈炳应同志从中发现1册木活字版印本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交馆登记珍藏。（俄 军）

八 武威市博物馆藏卷综述

1987年5月武威市新华乡缠山村群众在亥母洞寺遗址施工中，发现了一批西夏文经卷及西夏手抄文书，这批西夏文物内容丰富，数量较多，共34件。其中有世俗文献和佛教文献。

（一）世俗文献

1. 西夏文字书《音同》一面。《音同》是西夏文重要辞书之一，是研究西夏语言文字，尤其是研究西

① 陈炳应：《西夏人对活字印刷术的杰出贡献》，《陇右文博》2005年第2期。

② 陈炳应：《珍贵的西夏语音材料》，《民族语文》1987年第4期。

夏语音系统的重要资料。《音同》有甲乙两个版本，全书按声母类别分为九品，依次为重唇音一品，轻唇音二品，舌头音三品，舌上音四品，牙音五品，齿头音六品，正齿音七品，喉音八品，来日舌齿音九品。亥母洞出土的《音同》系乙种本第46页右面，是国内保存较完整的一面。

2. 西夏文文书6件。其中有乾定申年（1224年）典廩契约、乾定酉年（1225年）卖牛契约、乾定戌年（1226年）记账单，这些社会文书对研究西夏晚期民间的经济关系、社会习尚等都是宝贵的资料。其中两件盖有西夏文印章，是国内已发现的西夏文文书中少有的，对研究西夏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有重要价值^①。

（二）佛教文献

在出土的这批西夏文献中，西夏文佛经的数量最多，有27件，有些经卷首尾完整。在这些经卷中有一件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经专家研究，是迄今发现的第一件泥活字版本。它的发现填补了我国泥活字版本的空白，特别是为研究我国早期活字印刷术——泥活字版本学增加了新内容，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此经对研究西夏的佛教也具有重要价值^②。

另有西夏文写本《大千守护经中说五种守护吉祥颂》、西夏文写本《佛教文献残卷》、西夏文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西夏文刻本《净国求生礼佛盛赞颂》、西夏文刻本《佛说百寿怨结解陀罗尼经》、西夏文刻本《佛说调伏三灾经》以及集颂、咒语等。以上佛经中有的为国内外西夏文经卷收藏中所仅见，对研究西夏佛教经典和佛教在西夏的传播都有重要价值^③。

（杨 福 胡爱玲）

九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卷综述

中央电视台在拍摄大型纪录片《望长城》的过程中，在内蒙古额济纳旗绿城遗址内发现了一批重要的西夏文物，有两尊彩绘泥菩萨像，还有多种西夏文佛经。这次发现的文物后来交内蒙古博物馆收藏。

（一）数量和种类

绿城发现的西夏文文献有多种西夏文佛经，经史金波先生整理翻译后，主要有以下几种佛经。

1. 《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刻本，蝴蝶装，四周单栏，白口。存11页，21面，面7行，足行17字。前后皆残失，据其内容和存留的小标题，可确定其经名。此经有的版本分为32分，此残刻本中包含了第6、7、8、9、10、11、12、13、14、17、18、19、20各分的内容，其中有9个分题。

2. 《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德依经集》，前残，存12面。经折装，上下单栏，每面7行，足行13至14字。前11面为咒语、颂语和经文。第12面1至7行为跋尾。

3. 《顶尊相胜总持功德依经录》，存9面。刻本。经折装，上下单栏，第1、2面为经图，第1面中为观音跏趺坐像，下有莲花座，左右上角有飞天，第2面有四菩萨，图四周以金刚杵为边饰，第3面以后每面7行，足行13字，第3面始3行为梵语经名，第4行为西夏语经名“番语顶尊相胜总持功德依经集”，第5至7行是3行小字，译文为：“西天大波密怛五明国师功德司正赐乃将沙门叶也阿难捺传，显密法师功德司副赐益盛沙门周慧海译”，以下6面，都为经文。

4. 《佛说消除一切疾病陀罗尼经》，写本，存14面，经折装，上下单栏，面4行，行9至10字，第1面1、2行为经名，第10面第2、3行为经末经名，第1至10面为经文。

5. 《慈悲道场忏罪法》封面，有两种。皆以黄色纸裱褙而成，表层有绢帛裱衬，上贴经名纸签。第一个封面纸签仅存半截，译文为“……忏罪第三”，第2个封面西夏文译文为“慈悲道场忏罪第十”。此次发现只有封面，未见经文。

在绿城发现的文献中，还有一些零散的西夏文刻本、写本佛经残页，此次发现的还有4种《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残片。第一种为刻本，经折装，上下单栏，面7行，行15字，存3面。内容为第13分的大

① 孙寿岭：《西夏乾定申年典廩契约》，《中国文物报》1993年第5期。

② 孙寿岭：《西夏泥活字版佛经》，《中国文物报》1994年第3期；史金波：《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西夏活字印本考》，《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1期。

③ 孙寿岭：《武威亥母洞出土一批西夏文物》，《国家图书馆学刊》增刊《西夏研究专号》2002年8月。

（二）文物价值

绿城出土的《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第1种和第3种刻本和俄藏西夏文《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可能为同一种刻本，俄藏刻本中有两种在刻经题款中有年款，5378号记天盛甲申岁十六年（1164年），4095号记天盛戊子二十年（1168年），皆刻于西夏仁宗时期。西夏对《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特别重视，不仅将其译成西夏文，还大量印制施放，在西夏乾祐二十年刻印的汉文《观弥勒菩萨上天兜率天经》发愿文中记载，当时一次法会上就散施汉文《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5万卷。此经还是西夏名僧讲释的重要经典，天盛十九年刻印的汉文《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经》发愿文中记载了在皇太后周忌之辰，请觉行国师讲演《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绿城出土多种版本的《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证明此经在西夏流传广，影响大。

绿城出土的这些佛经为研究佛教源流史提供了新的材料。

（三）学术价值

（四）版本价值

《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前残，存 12 面。经折装，上下单栏，每面 7 行，足行 13 至 14 字。前 11 面为咒语、颂语和经文。第 12 面 1 至 7 行为跋尾，译文为：今大悲心总持者，威德难疑，神力

无量，口所爱乐，依意满足，何如中愿；尽皆成就，因有如此功，先后几经印刷，诵经者甚多，印板遂残破，因用显弱口，真使重新雕刻印板，受持为易，有受持赎者，殿前司西左上来赎。

由发愿文可知，此经在西夏几经刻印，诵此经者甚多。并明确告知信徒可到殿前司西左上来赎经，此经似是一种官刻本。

此经由藏文传译而来，目前国内发现的由藏文译成西夏文的佛经很少。此经国内已有发现，但仅有字数极少的残片。此次绿城发现的经文页面较多，而且比较完整，还有刻经跋文，在国内还属首次。

俄国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献中有该经的西夏文和汉文刻本。西夏文本为 6881 号，刻本，首有经图，后有梵语、番语（西夏语）经名，也是一残本，每面 6 行，行 14 字，可见绿城出土的是一种新的版本。

《顶尊相胜总持功能依经录》，存 9 面，刻本，经折装。卷首有经图，第 3 面始 3 行为梵语经名，第 4 行为西夏语经名“番语顶尊相胜总持功德依经集”，第 5 至 7 行是 3 行小字题款，译文为“西天大波密怛五明国师功德司正赐乃将沙门哆也阿难捺传，显密法师功德司副赐益盛沙门周慧海译”，以下 6 面，都为经文。

绿城发现的前经《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与此经前后相连，俄国所藏西夏文和汉文佛经中此二经也是相连的，两经传译者也相同，传者哆也阿难捺和译者周慧海为弘扬佛教曾多次合作，为西夏后期的佛教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另有本经的一种木刻本，残存 5 面，经末发愿文存 13 行，从内容可知，这一发愿文为《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和《顶尊相胜总持功能依经录》这两种相连佛经的共同发愿文，是一篇御制发愿文，此次印施佛经专为已故皇后所作。

《佛说消除一切疾病陀罗尼经》，写本，存 14 面，经折装。第 10 面 4 至 14 行，主要内容为：若人不能全诵此经，可先说神咒及诵持三种皈依佛名，亦可消除疾病及一切灾祸。此经在国内为首次发现，虽有残损，但内容较为完整，为我国的西夏文增添了新的品类。

《慈悲道场忏罪法》封面，有两种，皆以黄色纸裱褙而成，表层有绢帛裱衬，上贴经名纸签。第 1 个封面纸签仅存半截，译文为“……忏罪第三”，第 2 个封面西夏文译文为“慈悲道场忏罪第十”。此次发现只有封面，未见经文。北京图书馆藏有西夏文《慈悲道场忏罪法》，刻本，存 8 卷，北图所藏也有封面和题签。

绿城出土的这些西夏佛经与宋版佛经属同一时代，距今已有 800 年，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属于稀有的珍善本，具有很高的价值。

（五）整理沿革

中央电视台在拍摄大型纪录片《望长城》的过程中，在内蒙古额济纳旗绿城遗址内发现了一批重要的西夏文物，有两尊彩绘泥菩萨像、多种西夏文佛经。中央电视台在播发此专题节目前，曾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史金波先生审看纪录片，对发现的文物进行鉴定。这次发现的文物后来交内蒙古博物馆收藏。1993 年 10 月内蒙古博物馆的翁善珍赴额济纳旗绿城遗址进行考察，据考察，绿城遗址现存四座残破的庙宇，在南面的一座残破寺庙中发现了这两尊泥菩萨像，在东面的寺庙中先发现有露出地表的约十厘米的木柱，木柱下有一泥佛的半截胳膊和这些西夏文经书及散乱的残片，此外还有一幅唐卡。1993 年史金波先生对绿城出土的散乱的西夏文佛经进行整理和翻译后，与翁善珍合作写成《额济纳旗绿城新见西夏文物考》一文，介绍了这些西夏文佛经的现状和价值，为研究绿城出土西夏文献提供了第一手资料^①。（苏 东）

十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卷综述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西夏文书为 1983 年和 1984 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在黑水城遗址的发掘品。

^① 史金波，翁善珍：《额济纳旗绿城新见西夏文物考》，《文物》1996 年第 10 期。

（一）黑水城遗址

黑水城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政府达赖库布镇东南 25 公里的巴丹吉林沙漠边缘地带，地理坐标为北纬 41 度 45 分 40 秒，东经 101 度 5 分 14 点 85 秒，海拔高度 870 米。西夏时期此处为黑水监军司所在地，系西夏王朝在北方边疆设置的一处军事重镇。西夏语称黑水为“亦集乃”，现代的额济纳是“亦集乃”的转音。黑水城蒙语称“哈拉浩特”（黑城）。黑水城原来建立在额济纳河（古称弱水、黑水）下游的绿洲地带，14 世纪 40 年代末期，明军攻打亦集乃路，切断河流，额济纳河从此改道北流，亦集乃城的水源断绝，使宜农宜牧的绿洲变为荒漠，居民迁往别处。

黑水城遗址地处沙漠边缘，属温带干旱气候，年最高气温为零上 47 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下 35 摄氏度，夏秋之交日温差约 30 摄氏度。常年有五六级西北风，最高风速达八级。年平均降水量 37 毫米，年平均蒸发量 3700 毫米。由于气候极度干燥，遗址内埋藏的纸、木、草、毛、丝织品等大量有机质文物经过高温快速干燥脱水后埋藏在水荒漠地下，便长期保存了下来。据发掘探明黑城有上下两座城址叠压^①。现在在地表看到的黑城城墙是元代扩建的亦集乃路故城，西夏黑城被圈压在亦集乃路城内东北隅^②。

西夏时期的黑水城东墙和北墙的城墙是元代亦集乃城的基础，西墙和南墙被元代居民改造利用，分割成不相连属的数段。黑水城城墙平面呈方形，边长 238 米，夯筑城墙。南墙设城门，有瓮城、马面、角台等设施。城内主要有驻扎官兵的住所，还建有民居和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寺庙。

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 年）在黑水城设置亦集乃路。元代亦集乃路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 421 米，南北宽 374 米。天元年间（1379~1388 年）废弃。

1908 年、1909 年科兹洛夫（П.К.Козлов）率领探险队在黑水城盗走大批西夏文、汉文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和文物，文物收藏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文献则保存于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③。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urel Stein）于 1914 年也从黑水城挖掘出一大批文物，其中有西夏文和汉文文书。他将盗掘所得文物运回英国，藏于大英博物馆^④。1927 至 1935 年中瑞（中国和瑞典）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中方团长徐旭生和瑞方团长斯文赫定（Sven Hedin）率领下，自北京启程，经内蒙古包头、达茂旗、阿拉善旗、额济纳旗等地进入新疆^⑤。考察团团员黄文弼考察了黑水城及附近地区古迹，在城内采集数百件文书，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考察黑水城活动^⑥。

新中国成立后，额济纳旗先后归属甘肃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两省区文物部门先后对黑水城进行了多次调查和发掘。1962 年和 1963 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在居延地区调查，在黑水城采集到少量文书。1964 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黑水城为第一批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6 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调查了黑水城及周围地区，采集了一些文书。1979 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在黑水城内再次获得少量文书。

1983 年 9 至 10 月和 1984 年 8 至 11 月，内蒙古自治区的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阿拉善盟的文物工作站组成以李逸友研究员为队长的考古队，对黑水城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工作，这是第一次对黑水城进行的全面、系统、科学的考古发掘。这次发掘勘测了全城，发掘面积 11000 余平方米，清理房址 280 多座，探明了全城布局和沿革，出土大量文物，其中文书近 3000 件，汉文文书数量最多，共计 2200 余件，还有西夏文、畏兀儿体蒙古文、八思巴字、藏文、亦思替非字、古阿拉伯文等多种民

①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黑水城考古发掘纪要》，《文物》1987 年第 7 期。

② 据西夏王朝法典《天盛律令》记载，黑水城为当时西夏十七个监军司之一，又是十个边中转运司之一，见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 年，第 362、370 页。《元史·地理志》载：“亦集乃路，下。在甘州北一千五百里，城东北有大泽，西北俱接沙泽，乃汉之西海郡居延故城，夏国尝立威福军。元太祖二十一年内服。至元二十三年，立总管府。”

③ 彼·库·科兹洛夫：《蒙古、青海和哈拉浩特遗址》，苏联国立地理书籍出版社，1948 年；彼·库·科兹洛夫著，王希隆，丁淑琴译：《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 年。

④ 向达：《斯坦因黑水获古记略》，《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4 卷 3 号（西夏文专号），1932 年；斯坦因著，向达译：《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1946 年。

⑤ （瑞典）斯文赫定著，徐十周等译：《亚洲腹地探险八年》，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 年。

⑥ 徐旭生：《徐旭生西游日记》，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年。

族字文书^①。这批文书是西夏至北元期间极为珍贵的史料,反映了黑水城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此次发掘用考古学方法对出土文书进行了正确断代,纠正了以往把许多元代和北元文书误断为西夏文书的错误。2001 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联合使用全站仪和 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测绘了黑水城城址,对黑水城布局有了更科学的认识^②。同年,国务院公布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黑水城遗址归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居延遗址内^③。

(二) 数量和种类

1983 年和 1984 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黑水城发掘出土的西夏文书均为残页,共计 279 纸。主要是西夏文文书,西夏时期的汉文文书发现数量少,个别文书是西夏文和汉文合璧书写的文书。按文书内容可分为世俗文献和宗教文献两大类。

1. 世俗文献

世俗文献涉及面广,可大致分为书籍和社会文书两类。书籍中有西夏文《音同》《三才杂字》《新集碎金置掌文》《天盛律令》、占卜书,以及西夏文和汉文合写历书等。

其中西夏文字书《音同》残页较多。《音同》是一部很重要的西夏语文学著作,收录全部西夏字六千字左右,以声类排列,每字下皆有简短的释义。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有多种刻本,甲种本共 56 页,乙种本形式与甲种本相类似。此次发现的《音同》残片主要是乙种本,共 29 纸。

西夏文蒙书《三才杂字》,简称《杂字》,其内容以天、地、人分为三章,天章包括天体星辰、雷电风云等;地章包括地山河海、宝物、衣饰、动物、植物等;人章包括姓名、亲戚、身体、屋舍、饮食、器皿、诸司、军杂事项等。此次发现西夏文《三才杂字》有两残纸。一残页(F57: W1/0849)存西夏文 6 行,前 4 行系地章的末尾,内容为“昆虫爬虫”类的一部分,后 2 行是人章的开始。又一残片(F6: W13)存西夏文 2 行 8 字,每行 4 字,两字一组。从其字词排列方式和词义内容看,是《杂字》“地”类的一部分。

西夏文《新集碎金置掌文》简称《碎金》,是类似汉文《千字文》一类的通俗读物,西夏宣徽正息齐文智编。编者巧妙地将 1000 个不重复的西夏字编成长达 200 句、100 联的五言诗。其内容开始是序言,简述编书目的;正文开始是自然现象、时节变化等;后为人事,包括帝族、官爵、蕃姓、汉姓、婚姻家庭、财务百工、禽兽家畜、社会杂项等。此书对研究西夏的社会、民族、文学、教育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此次黑水城发现的《碎金》系 3 纸残页,一为序言(F6: W4),二为正文(F6: W5 83H28、83H57)。

社会文书包括借贷契约、诉讼文书、户籍粮账等。借贷契约是一件乙亥年贷粮契,较为完整。诉讼文书为己卯年告状案,有大小两件,皆为残片。户籍粮账系一残页,时间是“壬午年”,推测为西夏晚期光定壬午十二年(1222 年),距西夏灭亡仅 7 年。这是以户为单位登记的纳粮账。

2. 宗教文献

此次出土佛教文献数量多,绝大部分为残页,种类有佛经、经文注疏、要论、经咒、发愿文、僧人名单、帛幡等,绝大部分用西夏文书写,只有《大方广佛华严经·光明觉品第九》卷首残页用汉文书写。文书涉及佛经种类较多,能查明文献的有《大悲总持》《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大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调伏集义补》第八、《大智度论》《佛顶心陀罗尼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光明觉品第九》《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佛说天散节下经》《慈悲道场忏罪法》《圣胜慧集颂经》《陀罗尼经咒》等。

(三) 价 值

通过 1983 年和 1984 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黑水城首次大规模科学发掘,考察清楚了黑水城的建制,所得文书出自遗迹单位,时代明确,西夏、元代、北元各时代文书特点鲜明,为订正以前黑水城出土文书时代提供了科学标准,对文字学、版本学、古籍校勘学、宗教学、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等学科意义重大。

①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盟文物工作队:《内蒙古黑水城考古发掘纪要》,《文物》1987 年第 7 期;史金波,黄振华:《黑水城新出西夏文辞书〈音同〉初释》,《文物》1987 年第 7 期;李逸友:《黑水城文书所见的元代纳怜道站赤》,《文物》1987 年第 7 期。

②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测绘资料。

③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 年。

这次黑水城发掘出土书籍《音同》《三才杂字》《新集碎金置掌文》《天盛律令》、占卜书、历书等都是西夏人自己的著作。

《音同》发现的 29 纸残页，涉及 23 页，占《音同》总页数的 40% 左右。从残片看，属于《音同》甲、乙两种版本，主要是乙种本。其中一纸是《音同》乙种版本中第 54 页（F6: W），复原后可得近 40 字，是国内外藏品中独有的孤本。

《三才杂字》有 2 纸残页，其中一纸残页（F6: W13）中有 2 行，每行 4 字，两字一组，有 3 字补充了敦煌藏本和俄藏本的缺漏，字数虽少，其内容非常重要。写本《三才杂字》是国内外仅存版本。

楷书西夏文和汉文合写的历书是比较少见的文书。

西夏文《新集碎金置掌文》简称《碎金》，对研究西夏的社会、民族、文学、教育有重要价值。

借贷契约（乙亥年贷粮契）有立文契时间、借粮人名、借贷原因、借贷者、借粮品种、借粮数量、利率、相借者、担保者及其他条件，最后有签字画押：包括立契人、相借者、担保者，还有一人因文契略有残缺，不明其身份，依其他西夏文书例，很可能是“知见人”，即见证人。借粮文契典型而真实地描绘了西夏黑水城地区的借贷方式和借贷关系，和中原地区并无二致。

诉讼文书（己卯年告状案）案分若干条，残片保存 3 条，前后两条残。内容为立文人孙某分段叙述自己娶妻的经过、给女人的首饰和所给的婚价。反映了当时的婚姻制度和习俗。

户籍粮账文书记载了纳粮的具体种类和数量，反映了在西夏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农村缴纳租税的实际实施情况，对研究西夏钱粮赋税制度有重要参考价值，是西夏重要的经济史料。

此次发掘出土的宗教类文书反映了西夏佛教流行的盛况，其中不乏珍品。用泥金书写的西夏文佛经《大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罕见的西夏文书法精品。汉文佛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光明觉品第九》刻工刀法纯熟，字体方正端庄，堪称刻经上乘。《大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现存唯一的刻本，至为珍贵。在经卷残页中有多西夏文活字印刷品，其中很多字四角圆钝，笔画不甚流畅，边缘不整齐，笔画古拙，缺少尖锋，有残断现象。文字大小不一，一行中字列不齐，有的字左突，有的字右出，在多数行中有此现象。一行中上下字距离较宽，无相触、相交现象。栏框双线交角处不连接，版心单线和上下栏线也不连接。应是泥活字印本，十分珍贵，再次证明西夏比较广泛地使用活字印刷。写本僧人名单对研究西夏寺庙和僧人成分很有价值。

（四）整理经过

发掘后在整理文书的过程中，塔拉、王建国、徐宁等参加了装裱工作，郭治中和李少兵抄录了少量汉文文书，李逸友对汉文文书进行了研究，于 1991 年出版了《黑水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①。

发掘后经过装裱后，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将出土的西夏文书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由西夏研究中心史金波、黄振华同志整理，发表初步研究成果。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史金波先生完成了全部西夏文文献的考释和研究，交内蒙古考古研究所。

这次《中国藏西夏文献》编纂过程中，索秀芬、李少兵又对 1983 年和 1984 年发掘出土的文书进行整理，发现了一些尚未考释的西夏文书，交史金波先生研究。至此，对 20 世纪 80 年代发掘出土西夏文书整理、考释、研究工作告一段落。

（索秀芬 李少兵）

十一 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文物管理所藏卷综述

内蒙古额济纳旗是著名的黑水城所在地。黑水城是西夏时期北部重镇，为黑水监军司驻所。由于这里气候干燥，降雨量很小，蒸发量极大，因此地下不仅出土了大量容易朽毁的古代简牍，还出土了大量更容易腐烂的纸本文献。中国 20 世纪四大文献发现中有两种属于额济纳旗：居延汉简和黑水城西夏文献。

黑水城遗址在今额济纳旗政府所在地达赖库布镇东南约 25 公里的荒漠中。1908 至 1909 年以科兹洛夫为首的俄国探险队，在黑水城遗址掘获大批文献、文物，席卷而归，其中以西夏时期文献为主，现存于俄

^① 李逸友编著：《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文物出版社，1991 年。

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和艾尔米塔什博物馆。20世纪50年代初,其中21卷西夏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回藏中国国家图书馆。1914年斯坦因自黑水城也攫取了很多西夏文献、文物,今藏英国大英博物馆。1927年以瑞典斯文赫定和中国北京大学徐炳昶教授为首组成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曾到额济纳旗考察。中方团员黄文弼先生在黑水城得到一批西夏文献,分藏于瑞典民族学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新中国成立后,额济纳旗先后分属甘肃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管辖。两省区有关部门多次对黑水城遗址及邻近地区进行考察和发掘,得到数量不等的西夏文献。1962至1963年期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到黑水城调查,在附近寺庙遗址中发现很多精美西夏泥塑人物像。1976、1979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也在黑水城及其附近地区考察,得到少量文书,今藏甘肃省博物馆。1983年和1984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在黑水城遗址进行了较长时间的系统发掘,出土不少西夏和元代的文献和文物,文献中包括西夏文、汉文、老蒙古文、八思巴字、藏文等,今藏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1985年5月额济纳旗文物保管所普查时在黑城西北角400米处发现2纸西夏文残页。1991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纪录片《望长城》时,摄制组在绿城北7公里处一寺庙遗址内发现了西夏文文献和文物,大部藏于内蒙古博物馆,少量留藏于额济纳旗文物保管所。2005年4月中央电视台拍摄《新丝绸之路》第8集《探访黑水城》时,在绿城寺庙附近发现写有西夏文字的瓷缸残片。

额济纳旗出土大量西夏文献,改变了西夏资料匮乏的状况,使国内外学术界为之瞩目。以这些资料为重要基础的一门新兴学科——西夏学应运而生。

目前保存在额济纳旗文物保管所的仅有15页西夏文献。其中分为4种:两种是西夏文蝴蝶装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为7页,一为2页;第三种是西夏文刻本《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及发愿文共4页;第四种是两页残片。前3种在内蒙古博物馆所藏同时出土的刻本中有相同版本。

西夏对《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特别重视。此经是西夏名僧讲释的重要经典,据天盛十九年(1167年)刻印的汉文《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经》发愿文中记载,在皇太后周忌之辰,请觉行国师讲演《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西夏时期大量印制施放此经,西夏乾祐二十年(1189年)刻印的《观弥勒菩萨上天兜率天经》发愿文中记载,当时一次法会上就散施汉文《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5万卷。绿城出土多种版本的《金刚经》,证明该经在此地流传广、影响大。这两种版本皆为国内首次出土。

所藏《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和《顶尊相胜总持功能依经录》两者的传译者也相同,相连印刷,后有御制发愿文。此次绿城发现的此经页面较多,在国内还属首次。(史金波)

十二 西安市文物局藏卷综述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所藏西夏文物,按材质与内容大致分为经卷、陶瓷器及金石器等3大类,计十余种。根据相关档案资料,除3件褐色釉三鸟双耳小口罐及个别西夏钱币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购自西安文物商店外,其余皆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经由当时的西北军政委员会转交而来,不过其出土地点及具体来源情况俱不可考。尽管就数量而言,这些文物总量不大,但内容却多不重复,且不乏诸如御制西夏文泥金写经及西夏文敕燃马牌等目前国内仅见或少见的精品,价值不容低估,故很早就引起了西夏学相关专家的重视。1976年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史金波与白滨先生专赴西安,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时称西安市文物管理处)展开合作,对这批西夏文物进行整理和研究,并将相关成果撰文发表^①。

此次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受邀参加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中国藏西夏文献》中陕西卷的编撰工作,对所藏西夏文物再次进行整理和研究,并获得了一些新的发现和收获,本文拟在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有关西夏文书作以补充和探讨,以供学界参考。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所藏西夏文书皆为佛教经卷,共6种,其中除原编号2gz59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卷9为汉文与西夏文押捺并存一经外,余者皆为西夏文佛经。

^① 西安市文物管理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西安市文管处藏西夏文物》,《文物》1982年第4期。

（一）西夏文刻本佛经残卷卷首及释迦佛图

该经为经折装，残损严重，仅存封面及卷首释迦佛图一幅二面，封面有题签，上书西夏文经名及千字文编号“月”字，经名前3字漫漶不清，余5字经译释，知为“经契卷八第”即“……经契卷第八”。封面背页有相互夹杂之手书汉文，汉文为“□堂道速”，中夹西夏文一字。卷首释迦佛图毁损甚剧，图中所刻除释迦佛及其他诸神外，尚残存礼佛之僧俗人物六身及西夏文题款6条计25字，内容为图名及相关僧俗人物的身份和姓名。上部题款译名为“释迦佛”，下部题款自右而左分别为“兰山雄响禅师”“兰山云凤禅师”“沙门慧和”“罗法净”“麻骨氏？白”。题款中所谓“兰山”者，系为贺兰山之省称，其名多见西夏时期的佛教文献中，如夏仁宗时期的汉文《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御制发愿文、《圣大乘胜意菩萨经》发愿文及《四分律行事集要显用记》题款，桓宗天庆七年（1200年）汉文《〈密咒圆因往生集〉序》^①，据此可初步推断该经属西夏时期。

（二）西夏佛经残卷

该经为西夏文刻本，卷轴装，首尾俱残，经卷经名、卷次俱失，内容经译释，大致与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卷9相类，尚需要对其作进一步的研究。

（三）西夏文写本《金光明最胜王经》

该经为西夏文泥金写经，经折装，残存22面，经末有发愿文2面12行。经页纸质厚韧，呈青紫色，以赤金西夏文楷书写成，书法工整。虽历经700余年，依然色泽不变，光彩夺目，堪称西夏写经中的上品。

该经内容经整理、译释，知为《金光明最胜王经》卷1、5和10的片断。如第1页《金光明最胜王经》卷1《序品》第一中从“甚深空性，皆已了知”到“地藏菩萨”；第2至4页从《如来寿量品》第二“彼侍者各诣释迦牟尼佛所”至“犹如父母余无等者，世……”；第5至6页同上品从“诸佛体皆同”至“现种种庄严”；第7至9页同上品从“诸愚夫行颠倒见”至“不恭敬我，常于我所……”；第10页从《金光明最胜王经》卷5《莲华喻赞品》第七“……应当谛听善思念之”至“身光照耀如金色”；第11页从卷10《大辩才天女赞叹品》第三十“我今随力称赞如来少分功德”至“相好如日月普利一切”；第12至22页从同卷《付嘱品》第三十一“广宣流布”至经末。

由于泥金写经成本高，非寻常百姓所能承受，故多为皇室勋贵或名僧大寺发愿布施制作，传世者由是较少，西夏泥金写经则更为罕见。据称，清朝末年，我国尚存西夏文泥金写经数册，但大都于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流失海外。20世纪30年代，罗福苙在译写西夏文《妙法莲花经弘传序》时即称，“右经序为仁宗时写本，庚子之乱，法人毛利斯氏得西夏写经3册于北京，皆紺纸金书，青绢面上有被覆，为薄函，其里纫黄绢，外纫蓝绢，上描金花叶，经首有佛像1页，经文每半页6行，行19字，缮写精绝。外面有汉文题签：西夏译添品妙法莲华经某卷。盖转翻隋弘始年阇那崛多等所译足本也。当时驻高丽法使署翻译官贝尔多氏亦得是经3册，定为内府收藏，殆庚子年散出者。今此序乃毛氏藏本中一页，得诸海外，传写时讹误殆不能免焉，据友人云：毛氏贝氏两家藏经现已归并处托法京国民图书馆保管，不知确否。罗福苙记。”^②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所藏《大方广佛华严经》卷9的西夏文押捺题款中也有“钞写金银字中华严一部”之语，这从另一方面说明西夏确有所谓金银字佛经的事实。

该经最有价值之处在于经末发愿文，该文共2页12行，计277字。内容译录如下：朕闻我佛世尊，以本根智，证一味真实义；依后得缘，开千异妙法门。其中守护国家，福智蓄集，世俗、胜义双全，现身、来世受益者，惟此《金光明王经》是也。今朕安坐九五，担万密事，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夜以继日，顺思远柔近能；废寝忘食，念国泰民安。自之所能，治道稀微已至；他上依顺，佛力复盖爱惜。因此，已见此经之深妙功德，澄信大愿虽已发，然旧译经文，或与圣意违，或词义不明，复亦需用疏无所译。因此建译场，延请番汉法定国师译主等，重合旧经，新译疏义，与汉本仔细比较，刻印流行，成万代平安。惟愿以此善根，常行德治，六合全和，□□道变，远传八荒。复愿？□□止，百谷成熟，□□□□□□□□次，万物具不失性，复愿沙界众生，法雨中洗除业垢。尘国众生，以佛日消除愚影。光定四年谨作^③该发

①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第262~264、272、277~278页。

② 罗福苙：《妙法莲华经弘传序释文》，《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

③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80~282页。

愿文涉及到西夏佛教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首先,发愿文起始处有“朕闻”及“今朕安坐九五,担万密事”等文字,足证其为西夏皇帝御制,而文末“光定四年”的落款,则可知该经写于西夏第八代皇帝神宗遵项光定四年(1214年)。这篇御制西夏文发愿文对研究西夏王朝晚期的佛教以及相关的宗教政策是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

其次,虽然西夏早在夏惠宗秉常时即已将《金光明最胜王经》译为西夏文,夏仁宗仁孝时又曾重校^①。但发愿文中“旧译经文,或与圣意违,或词义不明,复亦需用疏无所译”的词句说明,至迟西夏晚期,西夏统治者对于佛教依然十分重视,而且其校经时虽以番汉法定国师为译主,但仍以汉本佛经为校译底本,这也反映出西夏晚期佛教经典与汉文佛经的渊源关系。而汉文《金光明最胜王经》10卷,为唐义净译,是金光明三谛中最后出且最完备者,后有唐慧诏疏10卷。如推断无误,该经所译疏或源于此,这对于西夏佛教史的研究来说抑或为一个新的补充。

第三,发愿文中的“光定”年号系是首先见到的西夏文“光定”年号,这充实了对西夏文年号的认识。这一西夏发愿文也从侧面说明西夏王朝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末代困境,仍不惜人力、物力译写佛经,西夏统治者笃信佛教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四) 西夏文写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又称《大般若经》,属佛教大乘藏,汉译本原经600卷,唐玄奘译,为现存汉译佛经中卷数最多的一部。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所藏西夏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系梵夹装,残存73面,面高30厘米,宽11.5厘米,上下双框,框高25厘米。每面6行,每行17字,俱以西夏文行书写成,字迹清晰工整。内容经译释,知为该经第338卷。

从传世情况来看,这类西夏文经卷遗存较多。在公元1908至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于我国内蒙古黑水城遗址盗走的8000余件西夏文文书中,手写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就占有近2000个编号,为多种写经。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写本西夏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21卷,系黑水城所出,且多为完本。这些写经,有的书法流利、字体隽美,差错很少,有的则潦草从事,增删改正,挖补甚多。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所藏残经与国家图书馆所藏同类。

西夏共译大藏经3600余卷,据国内外所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卷次和数量看,约占西夏文大藏经的六分之一。经译释,这些写经大都与唐玄奘译出的汉文本相吻合。该经各卷卷末或背面往往有西夏文“校过一遍”4字,由此不难想见西夏文译经的依据版本和写经的制作过程,同时也可以看出西夏对于经文书写准确性的重视。

(五) 西夏文写本《瑜伽师地论》

该经为梵夹装,残存29面,字迹工整。内容大致类似于唐玄奘所译《瑜伽师地论》卷58中后部分。该经经背有汉文经文10面,内容皆为所谓供养文或请魂文,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曾先后两次提及“摩尼”之名,似乎表明该文与摩尼教有某种内在联系,倘事属不谬,则其对于更全面深入地认识和研究西夏宗教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不过由于文中未见作者、年代等内容,故目前尚难断定其是否确与西夏有关。

(六) 汉文刻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九西夏文押捺题款

该经残存2面,经折装,为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卷9末及其封底,封底与经页夹层处有刻本西夏文经文6行,经末有3方朱色汉字印文及一幅四边双栏长方形木刻押捺,汉字印文因褪色已不甚清晰。押捺经译释,知为僧人李慧月发愿文。译文如下:

番国贺兰山佛祖院摄裨园和尚李慧月、平尚重照禅师之弟子为报福恩印刷12部大藏经契及54部华严又抄写金银字中华严1部,全觉、莲华、般若、菩萨戒经,起信论等。

西夏文“番”字音“弭”,为西夏党项人自称,“番国”即指西夏。就目前所知,汉文和西夏文记载的西夏国名有数种之多,但直接以党项族名记录西夏国名的情况,尚不多见,这一题款对于研究西夏国名显然具有一定的价值。

“贺兰山”作为西夏的所谓三大神山之一,是西夏佛教寺院较为集中的地区,至明代时当地尚有“颓

^① 史金波:《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

寺百余”^①。依照题款所记，“贺兰山佛祖院”当为当时一座大寺庙。题记中“平尚”二字系西夏党项族姓，故宫所藏明代西夏文经卷和明代保定西夏文经幢题款中亦有此姓。“重照”当为人名，平尚重照禅师或为当时有名的党项僧人。其弟子李慧月，是入元的西夏遗裔，他在元代印制了不少汉文佛经，有的押捺西夏文款识^②。

综上所述，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所藏西夏文物虽数量有限，但种类丰富，且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

(孙福喜 赵斌)

十三 碑石、题记卷综述

(一) 种类与数量

《中国藏西夏文献·碑石、题记卷》由碑、石、砖刻(含瓷、银、铜器刻)与题记两大类组成，题记类又分墙壁题记、木质题记、瓷器题记、银铜器题记、丝麻织品题记等等，下面分别予以介绍。

其中碑、石、砖刻(含瓷、银、铜器刻)如下：

1. 碑刻

(1) 唐静边州都督拓跋守寂墓志铭并盖。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八月立石，陕西省榆林市文管会办公室藏。

(2) 唐延州安塞军防御使白敬立墓志铭。唐乾宁二年(895年)立石，陕西省靖边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藏。

(3) 故永定破丑夫人墓志文并盖。后唐长兴元年(930年)十月立石，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城墙文管所藏。

(4) 大晋故虢王李仁福妻读氏墓志铭。后晋天福七年(942年)二月立石，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文管所藏。

(5) 大晋故定难军节度判官毛汶墓志铭并盖。后晋天福七年(942年)九月立石，陕西省榆林市文管会办公室藏。

(6) 大晋国故夏银绥宥等州观察支使何德异墓志铭并盖。后晋天福八年(943年)四月立石，陕西省靖边县文管会办公室藏。

(7) 大晋故定难节度副使刘敬瑭墓志铭并盖。后晋天福八年(943年)七月立石，陕西省榆林市文管会办公室藏。

(8) 大晋绥州刺史李仁宝墓志铭并盖。后晋开运三年(946年)二月五日立石，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城墙文管所藏。

(9) 大汉故沛国郡夫人(李彝谨妻)里氏墓志铭。后汉乾祐三年(950年)立石，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文管所藏。

(10) 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后周广顺二年(952年)立石，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文管所藏。

(11) 故绥州太保夫人祁氏神道志。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文管所藏。

(12) 故大宋国定难军管内都指挥使康成墓志铭并盖。北宋乾德四年(966年)闰八月立石，陕西省榆林市文管会办公室藏。

(13) 大宋摄夏州观察支使何公墓志铭并盖。北宋开宝二年(969年)十一月立石，陕西省榆林市文管会办公室藏。

(14) 大宋故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墓志铭并盖。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八月立石，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文管所藏。

(15) 大宋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李继筠墓志铭并盖。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八月立石，内蒙古

① (明)胡汝砺纂修，(明)管律重修：《嘉靖宁夏新志》卷1《山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② 李际宁：《佛经版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41~147页。

自治区乌审旗文管所藏。

(16) 大宋国故管内蕃部都指挥使李光遂墓志铭并盖。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十一月立石。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文管所藏。

(17) 明故忠义官李仲墓志铭。河南新安县千唐志斋博物馆藏。

(18) 大夏国葬舍利碣铭。西夏天庆三年(1196年)立石。碑佚,文存〔明〕《嘉靖宁夏新志》。

(19) 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瘞佛顶骨舍利轨。西夏天祐垂圣元年(1050年)立石。碑佚,文存〔明〕《嘉靖宁夏新志》。

(20)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西夏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立石,甘肃省武威市博物馆藏。

(21) 吴旗金夏划界碑。金正隆四年(1159年)立石,陕西省吴旗县长官庙乡白沟村后梁山出土。

(22) 黑水建桥敕碑。西夏乾祐七年(1176年)立石,甘肃省张掖市藏。

(23) 闽宁村西夏墓2号碑亭残碑。16件,宁夏回族自治区考古研究所藏。

(24) 闽宁村西夏墓3、4号碑亭残碑。201件,银川市西夏博物馆藏。

(25) 闽宁村西夏7号墓残碑。13件,宁夏回族自治区考古研究所藏。

(26) 敦煌莫高窟六体真言碑。元至正八年(1348年)立,敦煌莫高窟藏。

(27) 大元顺天路达鲁花赤河西老索神道碑铭。元至正十年(1350年)立,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公园藏。

(28) 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立,河南省濮阳县东柳屯镇杨什八郎村杨氏家族墓地碑亭藏。

(29) 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立,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博物馆藏。

2. 石刻

(1) 西夏陵题刻碑座。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藏。

(2) 西夏陵石经幢。银川市西夏博物馆藏。

(3) 保定西夏文石经幢。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刻石,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公园藏。

(4) 甘肃永靖炳灵寺西夏文题刻。

(5) 甘肃永昌圣容寺六体石刻。

(6) 阴山岩画西夏文题刻。

(7) 贺兰山岩画西夏文题刻。

(8) 大麦地岩画西夏文题刻。

(9) 居庸关云台西夏文石刻。元至正五年(1345年)刻。

3. 砖刻

(1) 西夏陵戳印字砖。2种。

(2) 拜寺沟方塔戳印字砖。4种。

(3) 拜寺沟方塔西夏铭文砖。

(4) 拜寺口西塔佛龕塑字。

(5) 贺兰县宏佛塔戳印字砖。2种。

4. 瓷刻

(1) 灵武窑西夏瓷刻字棋子。2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2) 灵武窑西夏瓷刻梵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3) 灵武窑西夏瓷刻汉文。残片,10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4) 灵武窑西夏瓷砚印刻字。2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5) 灵武窑瓷刻西夏文。残片,3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6) 褐釉瓷扁壶刻西夏文。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文管所藏。

(7) 黑釉瓷瓶刻字。上海市博物馆藏。

5. 银、铜刻

- (1) 西夏文铜刀。3 件，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 (2) 灵武石坝铸梵字银盒。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藏。
- (3) 灵武石坝铭文银碗残片。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藏。
- (4) 内蒙古自治区西夏文铜刀。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
- (5) 西夏文六字真言铜镜。上海市博物馆藏。
- (6) 西夏文铜镜。

6. 木刻

- (1) 木质西夏文印章。

其中题记如下：

1. 墙壁题记

- (1) 拜寺口西塔穹室壁面题字。
- (2) 敦煌莫高窟西夏题记。西夏文墨书、题刻 46 处。
- (3) 安西榆林窟西夏题记。西夏文墨书、题刻 47 处。
- (4) 元代西夏僧人墨书题记。

2. 木质题记

- (1) 拜寺沟方塔塔心柱墨书铭文。
- (2) 拜寺沟方塔西夏文本牌题记。
- (3) 拜寺口西塔中心柱木题字。
- (4) 西夏木缘塔题记。甘肃省武威市博物馆藏。
- (5) 武威西郊西夏墓木板题记。3 块。
- (6) 武威西郊西夏墓汉文朱书木牍。
- (7) 武威下西沟岷山洞西夏文本简。甘肃省博物馆藏。
- (8) 贺兰县宏佛塔西夏文墨书木简。

3. 瓷器题记

- (1) 灵武窑西夏瓷西夏文墨书。残片，3 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 (2) 灵武窑西夏瓷汉文墨书。残片，2 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4. 银铜器题记

- (1) 灵武石坝墨书西夏文银碗。2 件，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藏。
- (2) 灵武石坝墨书西夏文银钵。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藏。

5. 丝麻织品题记

- (1) 拜寺沟方塔墨书丝织品。
- (2) 贺兰县宏佛塔天宫藏西夏文残绢。
- (3) 贺兰县宏佛塔汉文发愿幡带。

6. 砖题记

韦州康济寺塔西夏题记砖。4 块，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文管所藏。

(二) 发现与整理

清嘉庆九年(1804 年)，西北史地学者张澍在家乡武威清应寺发现著名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凉州碑”夏汉合璧，张澍根据汉文碑文中的西夏“天祐民安”年号，判定另一面不认识的文字为西夏字。他把这一发现记在《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并于公元 1837 年在《养素堂文集》卷 19 刊出，这是对西夏碑刻最早的发现与研究。

早期对西夏碑刻的研究往往和西夏文字联系在一起。公元 1870 年英国人伟烈(A Wylie)最先注意到居庸关六体石刻中的西夏文，但误断为女真小字。公元 1882 年法国人德维利亚(G Deveria)对河南开封宴台女真进士题名碑进行研究，发现该碑文字与居庸关石刻中所谓“女真小字”并无相通之处，开始怀疑

为湮灭的西夏文，但长期不能确认。直到公元 1898 年德氏考证了“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后，才最终证实了自己的看法。但这比张澍刊出《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一文，整整晚了 61 年，应该说张澍是西夏碑刻发现与研究第一人。1958 年日本村田治郎编著《居庸关》一书，其中居庸关六体石刻中的西夏文由西田龙雄阐释^①。1964 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敦煌文物研究所联合对敦煌西夏洞窟壁画、分期、题记等进行专题考察。其中史金波、白滨等在莫高窟和榆林窟 38 个洞窟中，发现各类西夏文题记 90 余处，计 235 行，1200 余字。后来在《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研究》一文中，公布了上述资料^②。

1972 至 1978 年以及近年，宁夏考古工作者对位于贺兰山下的西夏王陵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搞清楚西夏陵区九座帝陵共有碑亭遗址 16 座，200 多座陪葬墓约三分之一有碑亭遗址。目前已发掘的碑亭遗址有 11 座，出土夏、汉残碑 4411 块，其中仅存一二字或三五字者居多，十字、八字已属难得，一二十字者更属少见。

1972 年在甘肃武威张义乡发现西夏会款单、欠款单、西夏文本简等一批西夏遗物^③。1977 年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出土木条桌、木缘塔、木板画、木板题记等实物。木缘塔塔身用黄色书写梵文咒语，塔顶八角木板内墨书“故考任西经略司都案刘德仁，寿六旬有八，于天庆五年岁次戊午四月十六日亡殁，至天庆七年岁次庚辰（申）□夏十五日兴工建缘塔，至中秋十三日入课讫”^④。

1978 年，宁夏石坝发现西夏文墨书银器^⑤。1984 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连续三年对宁夏灵武窑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西夏瓷器，其中不少残片上有西夏、汉文墨书或刻划题记^⑥。

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从 1985 至 1991 年，先后维修清理同心县韦州康济寺塔、贺兰山拜寺口双塔、贺兰县宏佛塔、青铜峡 108 塔。1991 年又清理被不法分子炸毁的贺兰山拜寺沟方塔，获得大批西夏、汉文题刻^⑦。

在考古发掘的同时，一批西夏文史与考古工作者对西夏碑刻题记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郑绍宗、王静如、史金波、白滨、李范文等对保定西夏文石经幢进行了热烈的争论^⑧。1981 年罗福颐发表《西夏护国寺感应塔碑介绍》^⑨，对西夏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进行了介绍与研究。1984 年陈炳应出版《西夏文物研究》一书，专列西夏的碑刻，西夏的墓葬，西夏的铜器、金银器、瓷器和竹木器等章，对当时所能见到的西夏碑刻题记都进行了系统地探讨。1987 年王尧发表《西夏黑水桥碑考补》^⑩对碑文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考证。

此外，1987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发表《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磁窑堡瓷窑址发掘简报》，1991 年张连喜、马文宽发表《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磁窑堡出土钱币及墨书“吊”字瓷片》。1991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贺兰县文化局发表《宁夏贺兰县宏佛塔清理简报》，在同期刊物上，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青铜峡市文管所还发表了《宁夏青铜峡市一百零八塔清理维修简报》，1992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同心县文管所发表《宁夏同心康济寺塔及出土文物》。1994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文化局发表《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清理纪要》，1997 年孙昌盛发表《西夏方塔塔心柱汉文题记考释》。2002 年林英津发表《居庸关六体石刻西夏文再检讨》20 世纪末及 21 世纪初，陕西省榆林市在文物征集和打击文物走私和盗墓的专项斗争中，征集或缴获到拓跋守寂墓志铭、李仁宝墓志铭、李仁宝妻破丑氏墓志文等党项拓跋部家族墓志

① 村田治郎：《居庸关》，京都大学工学部，1958 年。

② 史金波，白滨：《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研究》，《考古学报》1982 年第 3 期。

③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发现一批西夏遗物》，《文物》1978 年第 8 期。

④ 宁笃学，钟长发：《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 年第 3 期。

⑤ 董居安：《宁夏石坝发现西夏文墨书银器》，《文物》1978 年第 12 期。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宁夏灵武窑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年。

⑦ 雷润泽，于存海，何继英：《西夏佛塔》，文物出版社，1995 年。

⑧ 郑绍宗，王静如：《保定出土明代西夏文石经幢》，《考古学报》1977 年第 1 期；史金波，白滨：《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考古学报》1979 年第 3 期；李范文：《关于明代西夏文经卷的年代和石幢的名称问题》，《考古》1979 年第 5 期；史金波，白滨：《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再探》，《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 年。

⑨ 罗福颐：《西夏护国寺感应塔碑介绍》，《文物》1981 年第 4、5 期。

⑩ 王尧：《西夏黑水桥碑考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 年第 1 期。

铭。^①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无定河镇十里梁党项拓跋家族祖茔也相继出土了李仁福妻湊氏墓志铭、李彝谨妻里氏墓志铭、李彝谨墓志铭、李光睿墓志铭、李光遂墓志铭、李继筠墓志铭等。围绕这些碑刻，学界发表了系列研究文章^②。

（三）文献价值

蒙古灭夏时，将西夏都城兴庆府的文物典籍付之一炬，加之元修宋、辽、金三史，没有给西夏修一部纪传体专史。因此，西夏文物考古资料，特别是有文字记录的碑刻题记就显得特别重要，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史籍的不足，下面扼要述之。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记述西夏太后与皇帝应瑞诏命重修凉州护国寺塔，塔成后刻碑记其功。碑文在记载这件事的过程中，留下了十分重要的历史资料，如夏崇宗乾顺赐予护国寺“钱千缗，谷千斛，官作四户”。西夏文“官作”二字非常重要，第一字为“农、耕”意^③。说明这个“官作”不是一般生产者，而是依附于官府的农业生产者即农奴。这一重要资料，使我们对西夏社会经济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碑铭中记载的“大夏”“大白高国”，是研究西夏国名的重要资料；关于凉州地震的记载，是重要的地震史料；西夏、汉两种文字对照，则是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前述西夏文字消亡数百年后，通过凉州“西夏碑”才重新认识。

保定西夏文石经幢刻于明弘治年间（1488~1505年），幢后记立幢人近百名，其中平尚、□移合讹、□命屈、昔毕、依罗、嵬名等党项族姓，说明明代党项人仍然存在，西夏文也在一定范围内使用。另外，河南省濮阳“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甘肃省酒泉“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以及河北保定“大元顺天路达鲁花赤河西老索神道碑铭”，为我们提供了西夏遗民及其后裔的活动情况。

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西夏文题记，大致可以划分为功德发愿文、供养人题榜和游人巡礼题名三种类型，这些题记既是西夏洞窟分期的重要依据，又是研究西夏历史的重要资料。题记记录了王子、贵族、官吏、高僧及僧俗平民的姓名、官职和在莫高窟、榆林窟的宗教活动，提供了西夏国名、纪年、官制、封号以及语言文字方面的资料，如题记中所见比较完整的西夏人名有60多个，其中可定为党项姓氏的有息玉、嵬名、杂谋、麻尼则、嵬立、酪布、骨匹、那征、味奴、讹三、千玉等数十个^④。

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木板题记，提到西路经略司、都案、西经略司都案等职官与大夏天庆元年（1194年）、大夏天庆八年（1201年）等年号。经略司一职最迟在天盛年间（1149~1169年）就已设置，《番汉合时掌中珠》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均记有这一机构，按照法律，地方重大军政事务都要上报经略司。《金史》卷61《交聘表》记载，乾祐八年（1177年）十二月，“遣东经略使苏执礼横进”，显然，这个东经略司与上述西经略司是相对应的。

宁夏石坝发现的西夏文银碗，分别在碗底用西夏文写明其重量是“三两”和“三两半”，经实测，其重量是114克和137.5克，由此可知西夏“两”的单位值38~39.1克，与宋朝“两”的单位值39~40克相近^⑤。这是两件非常重要的资料，它填补了西夏衡制的空白，同时也说明西夏在衡制方面“略与宋同”。

宁夏灵武窑西夏瓷残片上墨书“三十吊五十串”六字。如果千文一吊计算，“三十吊”分成“五十串”，

① 分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磁窑堡瓷窑址发掘简报》，《考古》1978年第10期；张连喜，马文宽：《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磁窑堡出土钱币及墨书“吊”字瓷片》，《考古》1991年第12期；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贺兰县文化局：《宁夏贺兰县宏佛塔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第8期；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青铜峡市文管所：《宁夏青铜峡市一百零八塔清理维修简报》，《文物》1991年第8期；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同心县文管所：《宁夏同心康济寺塔及出土文物》，《文物》1992年第8期；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文化局：《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清理纪要》，《文物》1994年第9期；孙昌盛：《西夏方塔塔心柱汉文题记考释》，《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林英津：《居庸关六体石刻西夏文再检讨》，《石璋如院士百岁祝寿论文集》，台湾南天书局，2002年；

② 邓辉，白庆元：《内蒙古乌审旗发现的五代至北宋夏州拓跋部李氏家族墓志铭考释》，《唐研究》第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周伟洲：《陕北出土三方唐五代党项拓跋氏墓志考释》，《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王富春：《唐党项族首领拓跋守寂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3期；杜建录等《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西夏学》第1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③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5页。

④ 史金波，白滨：《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研究》，《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

⑤ 董居安：《宁夏石坝发现墨书西夏文银器》，《文物》1979年第12期。

则每串也即一吊为六百文。宋朝以七百七十文为一贯，金代以八百文为一贯，则西夏有可能以六百文为一吊（贯）^①。

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塔心柱汉文题记涉及白高大国、大安二[年]寅卯岁、僧判、赐绯、都大勾当、仪鸾司等西夏国名、年号和职官制度等，其中“仪鸾司”《番汉合时掌中珠》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不载，可能设在西夏前期，其职掌与元昊建国前设置的翊卫司同，或干脆是翊卫司的另一称呼，负责卤簿仪仗，西夏后期被其他机构所取代。

唐五代宋初党项夏州拓跋政权墓志铭，是早期党项与夏州拓跋政权的真实记录，它解决了党项夏国历史上许多疑难问题。如关于西夏王族拓跋部的族属问题，自唐代以来就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元和姓纂》《辽史》《金史》认为出自鲜卑，《隋书》《旧唐书》《宋史》则认为出自羌族^②。持鲜卑说的依据是唐林宝《元和姓纂》，该书记录西夏王室先祖拓跋守寂是鲜卑族。持羌族说的则认为鲜卑拓跋部在历史上较为著名，“因而将党项拓跋氏误认为是鲜卑拓跋部之后”。但这仅仅是怀疑和推测，并没有确凿的证据。立石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的“拓跋守寂墓志铭”，明确记载拓跋守寂“出自三苗，盖姜姓之别，以字为氏，因地纪号，世雄西平，遂为郡人也”。显然元和年间（806~820年）成书的《元和姓纂》把拓跋守寂定为鲜卑之后是错误的，这个错误给后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以致后来的夏州拓跋李氏家族墓志铭，均认为党项拓跋氏出自鲜卑。史书记载西夏的姑表婚是单向的，如开国皇帝李元昊娶舅女卫慕氏为妻，第二代皇帝谅祚娶舅女没藏氏为妻，第三代皇帝秉常娶舅女梁氏为妻。拓跋家族墓志所记的姑舅表婚则是双向的，李彝谨（拓跋彝谨）的岳母为拓跋氏，显然是舅舅的儿子娶姑姑的女儿为妻^③。从而印证了西夏文有关“为婚”与“舅甥”“婆母”与“姑母”的含义^④。

拓跋家族墓志铭的发现，使夏州拓跋李氏世袭关系更加清晰，史籍中的谬误也得到了纠正。“大晋故虢王李仁福妻浚氏墓志铭”记浚氏与虢王李仁福育有五子，年齿顺序为长彝殷，次彝谨，三彝氐，四彝超，五彝温。彝殷（又名彝兴）、彝超新旧《五代史》《宋史》有记，长兴四年（933年）李仁福卒，彝超继立定难军节度使，清泰二年（935年）彝超卒，彝殷继立。可能彝超袭位在前，彝殷袭位在后，故《宋史》误记为“彝兴，彝超之弟也”，“浚氏墓志铭”可纠其谬。“大宋故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墓志铭”记其“宠弟五人”，分别是光文、光宪、光美、光遂、光信。李光（克）文和李光（克）宪，就是后来迫使李继捧交出节度使权力的“从父”。亲叔父反对李继捧袭位，故史称夏州“难起家庭”。

墓志铭称拓跋夏州节度使为“府主大王”，“李光睿墓志铭”更是称其“俨万乘之皇威，总八方之戎事”。“府主大王”有着国君般的权力，是夏州地区的主公和大王，它印证了《宋史·夏国传》关于“夏虽未称国，而王其土久矣”的论语。

夏州拓跋李氏家族墓志铭，多载志主葬于夏州朔方县仪凤乡奉政里，如后周广顺二年（952年），李彝谨“归葬于夏府朔方县仪凤乡风正里乌水原”；后汉乾祐三年（950年），李彝谨妻里氏“葬于夏州朔方县仪凤乡奉政里乌水之原”；后晋天福七年（942年），李仁福妻浚氏“附葬于乌水河之北隅，端正树之东侧”；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李继筠葬于“端正北原之上，附于先茔”。奉政里又作风正里，这里有一条乌水，茔地所在的乌水原台地，当为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无定河镇（原纳林河乡）附近的十里梁，乌水即今天的纳林河，因为上述墓志就在这里出土，这对研究西夏时期的夏州地理，增添了新的网点和坐标。

（杜建录）

① 张连喜，马文宽：《宁夏灵武磁窑堡出土钱币及墨书“吊”字瓷片》，《考古》1991年第12期。

② 唐嘉弘：《关于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再论西夏拓跋氏族源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吴天墀：《论党项拓跋氏族属及西夏国名》，《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认为拓跋氏出自鲜卑族；李范文：《试论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民族史论丛》，1980年；《再论西夏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1998年；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4~155页；史金波：《西夏境内民族考》，《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年；《陕北出土三方唐五代党项拓跋氏墓志考释》，《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增订本，认为属于羌族。

③ 《大汉故沛国夫人里氏墓志铭》。

④ 史金波：《西夏党项人的亲属称谓和婚姻》，《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

十四 西夏陵残碑卷综述

西夏陵是西夏王朝的皇家陵园，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郊约 35 公里的贺兰山东麓，在方圆 50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 9 座帝陵和 253 座王公贵戚的陪葬墓。它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西夏文化遗存，也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址保存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1988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一）西夏陵的考古调查与发掘

1971 年，宁夏展览馆派人对贺兰山下的古墓群进行调查，首次调查就在陵区北部一碑亭遗址发现了西夏文、汉文残碑，与有关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发现并确认此处规模庞大的古墓群即是西夏皇家陵园——西夏陵，从而揭开了西夏陵考古工作的序幕^①。在之后的 30 多年里，宁夏文物考古工作者对西夏陵进行了多次考古调查、测绘和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西夏陵的考古工作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 世纪 70 年代：1971 年至 1972 年试掘八号陵西碑亭；1972 年至 1975 年，发掘清理了 6 号陵墓室、东西两座碑亭，内神城南门遗址；清理了 7 号陵东、西两座碑亭；发掘了 M78、M79、M182 三座陪葬墓；试掘 M161 西碑亭；1976 年，发掘了陵区范围内的三座窑址，其中一座石灰窑、两座砖瓦窑；1977 年，发掘了陪葬墓 M177，清理了 5 号陵东、西两座碑亭和献殿遗址。这一阶段工作以考古发掘为重点，同时对陵区进行了多次调查，开展发掘工作前对陵区 15 座大墓自北向南进行了编号（当时认为均为帝陵），陪葬墓编号近百个。

第二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1986 年、1987 年两次对陵区北端一处建筑遗址进行了调查、发掘；1987 年清理发掘了 3 号陵东碑亭；1987 年、1990 年、1991 年三次对整个陵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与测绘，发现帝陵 9 座、陪葬墓 206 座，此次按照陵区地形的自然特点将其分为自南而北四个区。将帝陵、陪葬墓分开，以自南向北，东西线上自东向西为原则重新对帝陵、陪葬墓进行了统一编号。这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是对陵区全面调查和测绘、绘图，同时进行了部分发掘工作^②。

第三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至 21 世纪初：1998 年发掘清理了 3 号陵西碑亭；1999 年对陵区陪葬墓进行重新调查，发现陪葬墓增至 253 座；2000 年至 2001 年全面清理了 3 号陵地面遗址：阙台、献殿、东西南北四座神门、神墙基址。2004 年对陵区 253 座陪葬墓以四个区为单位重新编号，对帝陵、陪葬墓竖立了保护标志碑和编号桩。

（二）西夏陵出土残碑的数量和种类

在西夏陵 30 多年考古工作中，清理发掘单体遗址最多的是帝陵、陪葬墓碑亭遗址，陵区出土各类文物标本也以残碑数量大、内容丰富、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高而备受关注。西夏陵 9 座帝陵现存有碑亭遗址 16 座，253 座陪葬墓约三分之一有碑亭遗址。从 1971 年初始调查发掘碑亭至 1998 年发掘 3 号陵西碑亭遗址，共清理发掘碑亭遗址 11 座：3 号陵两座、5 号陵两座、6 号陵两座、7 号陵两座、M177 两座、M182 一座，11 座碑亭遗址共出土西夏文、汉文残碑 3700 余块。对 8 号陵西碑亭遗址、M161 陪葬墓西碑亭遗址进行了调查，采集残碑 67 块。另外，我们在历次陵区调查中采集各类残碑 108 块。

3 号陵出土残碑

1. 3 号陵西碑亭出土西夏文残碑 711 块
2. 3 号陵东碑亭出土西夏文残碑 360 块

5 号陵出土残碑

1. 5 号陵西碑亭出土西夏文残碑 63 块
2. 5 号陵东碑亭出土汉文残碑 26 块

6 号陵出土残碑

1. 6 号陵西碑亭出土西夏文残碑 388 块

① 钟侃：《西夏王陵初始调查记》，《宁夏考古记事》，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 年。

② 许成，杜玉冰：《西夏陵》，东方出版社，1995 年。

2. 6号陵西碑亭出土汉文残碑 321 块
3. 6号陵东碑亭出土西夏文大字残碑 48 块
4. 6号陵东碑亭出土西夏文小字残碑 290 块
5. 6号陵东碑亭出土石雕人像碑座

7号陵出土残碑

1. 7号陵西碑亭出土西夏文篆书残碑额 19 块
2. 7号陵西碑亭出土西夏文残碑 1265 块
3. 7号陵东碑亭出土汉文残碑 510 块

8号陵调查采集残碑

1. 8号陵西碑亭采集西夏文残碑 2 块（大字）
2. 8号陵西碑亭采集西夏文残碑 45 块（小字）
3. 8号陵西碑亭采集汉文残碑 2 块

M177 陪葬墓出土残碑

1. M177 陪葬墓西碑亭出土西夏文残碑 20 块
2. M177 陪葬墓西碑亭出土汉文残碑 15 块
3. M177 陪葬墓东碑亭出土西夏文残碑 55 块
4. M177 陪葬墓东碑亭出土汉文残碑 26 块

M182 碑亭出土残碑

1. M182 碑亭出土西夏文残碑 133 块
2. M182 碑亭出土汉文篆书残碑额 12 块
3. M182 碑亭出土汉文残碑 216 块

M161 西碑亭出土汉文残碑 18 块

西夏陵区采集残碑

1. 西夏文残碑 108 块
2. 汉文残碑 80 块

陵区北端建筑遗址出土残碑 3 块

贾敬颜先生藏西夏陵残碑拓片 197 片

（三）西夏陵出土残碑的特点及文献价值

历史上西夏陵毁坏严重。大规模、有组织的破坏当在蒙古灭西夏的战争中。今天所见西夏陵九座帝陵和大多数陪葬墓皆有盗坑，陵园地面建筑木作、瓦作结构部分全遭破坏，帝陵、陪葬墓碑亭，特别是碑破坏尤甚，从碑亭发掘和出土残碑情况看，原碑被砸碎后，碑文又被凿剥，有的残碑碑文关键处有凿字、刮字的痕迹，以达到后人无法缀连成句、释读的目的。因此出土残碑极为碎小，每处碑亭遗址都有大量敲凿极碎的无字残碑，出土 3700 多块残碑中残留有笔画，但不能识字者占一半以上。还有几块残碑上留有后人的刻字。尽管如此，西夏陵出土残碑作为记述帝陵、陪葬墓主生平事迹和为其歌功颂德的墓碑，内容涉及到西夏社会的诸多领域，是我们研究西夏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地理、语言、文字和丧葬习俗等方面极为珍贵的原始文献资料。

史书上虽然有西夏帝陵和陵号的简略记载，但仍不能与陵区内现存陵墓相吻合。西夏陵碑亭的发掘与残碑的缀合、考释为确定陵主和墓主提供了重要依据。7号陵西碑亭出土西夏文篆体碑额残块 19 块，经李范文先生缀合、考释为“大白上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文”，碑文首行释文为“……护城圣德至懿皇（帝）”^①。《宋史·夏国传》载：仁孝“谥曰圣德皇帝，庙号仁宗，陵号寿陵”。碑额与史书记载相符。据文献记载，仁宗仁孝御校过多部佛经西夏文译本，译经西夏文题款释为“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嵬名御校”。西夏文残碑中也有“惇睦懿恭”字样与史料相符。另外 7 号陵残碑中还发

^① 李范文：《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文物出版社，1984 年。

现多个年号，经推算均与仁宗仁孝大庆、天盛、乾祐等年号相吻合^①，从而可以确定 7 号陵为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之寿陵。这也是迄今西夏陵唯一确定陵主的帝陵。

西夏陵陪葬墓M182 只有一座碑亭，出土残碑为阴阳两面刻字，夏、汉合璧，内容大体一致，可互为补正。其中最大一块西夏文残碑存 381 字，汉文残碑存 96 字，是陵区出土文字最多的残碑，内容丰富、文献价值很高。两面碑文首行为碑题，西夏文译释为“梁国正献王之神道碑”，汉文残碑首行缀合为“尚书太师（尚）书令知（枢）密院事六……梁国正献王神道碑”，西夏文残碑中有“太师尚书令梁国公嵬名安惠”，由此确知M182 陪葬墓墓主姓嵬名，名安惠，属西夏皇族，曾受封梁国正献王，被尊为尚父，曾任“太师，尚书令，知枢密院事，六部□□”等职^②。碑文记述了墓主人嵬名安惠生平事迹，汉文残碑中碑文有“尤老至正德三（年）……谥曰忠毅公”，汉文残碑有“太后亲征怀德军，分遣诸将，公……”的记述，“太后”即梁太后，秉常之妻，乾顺之母，“怀德军”即平夏城。《东都事略·西夏传》载，永安元年（1098 年）冬“十月，梁氏复自将收复平夏城，溃还”，碑文所记载与史料相符。碑文中还有“毅惠两朝”“崇宗践位”，“天安礼定二年”等。根据碑文所记史实，也使我们可推断墓主人有生之年当在惠宗乾道年间至崇宗正德二年（1069~1129 年）^③。汉文残碑记“崇宗践位，虽总揽乾（坤）……上即令公城中兴于是……”，史载，公元 1038 年元昊称帝时定都于兴州，号兴庆府，桓宗纯祐天庆十二年（1205 年）改称中兴府，但碑文所记在崇宗即位后不久，即出现中兴这一名称，在西夏都城更名时间上，碑文记述可校史书之误。

西夏陵出土的西夏文、汉文残碑中有民族名、国名：吐蕃、契丹、大宋、鞑靼、番、汉、羌、匈奴、戎、夷等，它或是记述当时民族、国家之间征战、结盟、友好交往，或是追述历史，或是说明西夏国内民族状况等，是研究西夏时期国内外民族关系的珍贵资料。如 5 号陵东碑亭出土的汉文残碑“吐蕃是我邻”五字，字里行间流露出西夏与吐蕃友好的真实历史情景。

西夏陵出土西夏文、汉文残碑中以皇室成员的庙号、谥号、尊称名讳最为频繁，如太宗、毅宗、惠宗、崇宗、仁宗仁孝、风角城皇帝、明城皇帝、白城皇帝、圣帝、珠城皇帝、护城皇帝、永平皇帝、珍陵帝、皇太后梁氏、皇后罗氏、太子、朕、天子、皇母、太子绍隆、成安公主等，其中□城皇帝之“‘城’”疑是西夏人自己立的谥谥制，以表先世生前之业绩。实际上是与汉制不同的另一谥号，即人死后，根据死者生前行迹，而为主号”^④。李范文先生还进一步考证风角城皇帝、白城皇帝、明城皇帝，护城皇帝分别为景宗元昊、崇宗乾顺、仁宗仁孝的谥号^⑤。帝王、皇室成员尊号在残碑中所保存的信息为我们结合同类残碑碑文记述，研究西夏政治、礼法制度和较之正史，确定陵主提供了很好的材料，有的还可补史料之漏，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西夏陵出土的西夏文、汉文残碑中人名有：野利仁荣、梁元辅、乞勒、郭成、梁乞逋、梁武乞、都罗刘西、那征、普珠众香、小狗青、幹勒玉宁、嵬名安惠等，其中梁乞逋在文献记载中均误记为梁乙逋，曾受封正献王的得宠重臣嵬名安惠为史书失载^⑥。

西夏陵出土的西夏文、汉文残碑中有多个职官名号：中书令、知枢密院事、上柱国、御史、翰林、南院宣徽使、六部监门、都尉、金紫光禄大夫、朝议大夫、经略使、府尹、监军；太师、尚书令、太尉、仆射、丞相、文武大学士、南姓官、都大勾当、文孝恭、孝恭、节亲主等，还有梁国正献王、驸马都尉等称号和西夏官阶封号：正净、养孝、复全、义平、爱要、上大复、上大庇、阴女^⑦等。这些名号和封号充分印证了西夏仿宋设立文武官制和西夏以汉制职官为主要政治制度的史实。从职官名号看，西夏职官制明显有职、官两个不同系统。西夏蕃官名号的出现，对研究西夏是一套官制，还是蕃、汉两套官制，以及蕃、汉官名号关系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前人研究西夏官制多以文献记载为依据，考古文物资料涉及不多。西夏陵出土残碑所提供的极为重要的原始资料将会在西夏官制研究中发挥重大作用。西夏陵出土的西夏文、汉

① 许成，杜玉冰：《西夏陵》，东方出版社，1995 年。

② 许成，杜玉冰：《西夏陵》，东方出版社，1995 年。

③ 许成，杜玉冰：《西夏陵》，东方出版社，1995 年。

④ 李范文：《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文物出版社，1984 年。

⑤ 李范文：《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文物出版社，1984 年。

⑥ 李范文：《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文物出版社，1984 年。

⑦ 史金波：《西夏陵园出土残碑译释拾补》，《史金波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年。

文残碑中有甲子年号纪年及具体时间的记录,如天安礼定二年(惠宗秉常);(天仪)治平元年、正德三年、大德年(崇宗乾顺);大庆辛酉二年、大庆、天盛二年庚午秋(仁宗仁孝);光定五年(神宗遵顼);甲戌年、五年乙亥、戊子、癸巳十五年、甲戌五年、戊申、己酉、庚戌、庚戌四年、壬子、庚申、□午年、□午五年、□午十七年、□酉十七等。有地名如中兴府、灵州、银州、宥州、怀德军、德顺军、怀安城、五原郡、定远、贺兰山、藏财山等。有亲属称谓如:先祖、祖父、祖母、父母、父、岳母、舅、父子、女婿、侄、子孙、后世子孙等。有称谓如:王公、齐王、谥曰忠毅公、梁国公、官宰、监国、大将、众民、臣民、宋人、臣、奸臣、执笔僧监等。有政治术语如:上疏、敕、治国、行德治、圣旨、奉诏、统帅、文武兼备等。有宗教术语如:佛、三界、说法、浮图三学、院寺、僧等。有习俗术语如:议姻、古俗、祭祀、棺、香炉、饮酒等。还有法律、教育、建筑、天文以及气候等方面的记述。尤为难得的是,在7号陵东碑亭出土残碑中有崇宗乾顺《灵芝颂》一诗的残句,“(灵)芝颂一首其辞曰:于皇□□,俟时效祉,择地腾芳,□晕□□,德施率土,赉及多方,即启有……”。《宋史·夏国传》卷12载:南宋绍兴九年(西夏乾顺大德五年,1139年)“灵芝生于后堂高守忠家,乾顺作《灵芝颂》,俾中书相王仁宗和之”。碑文不仅印证了史料记载,也使我们得以见到西夏帝王诗词的风貌。

西夏陵出土残碑上的西夏文、汉文均有楷、篆两种书体。西夏文字是仿照汉字结构和笔画创制的方块字,笔画繁多而均匀。残碑中所见西夏文楷书明显受到唐代楷书的影响,书写工整,字体方正,“用笔藏露兼备,方圆并出,至细微处见匠心,既显骨力又见精神”^①。3号陵出土的西夏文残碑碑文,朴实、粗犷,字体偏长;5号陵西碑亭出土的西夏文残碑碑文笔画纤细,书写随意、流畅;6号陵东碑亭的残碑碑文则古朴、苍劲,字体方正;7号陵西碑亭西夏文残碑楷体碑文笔画均匀、字体秀丽、用笔纯熟,又是一种风格。7号陵西碑亭出土的碑额西夏文篆书,则承袭了汉文篆书的精髓,遵循了篆书“婉而通”的宗旨。其字体从西夏楷书的字体笔画结构变化而成,“笔画虽繁但墨路清晰,用笔十分讲究,从其行笔自然浑成不露痕迹上,足见其用笔之回环照应且错落有致;布局合理而揖让有方,整体上给人以肃穆端庄,秀茂纯古之感”^②。残碑中的汉文则唐代楷书风貌明显,具有一定的书法水平。5号陵东碑亭出土的汉文残碑碑文用笔挺劲,结构方正严整,平稳坚实,有欧体特征,其中一块为行书书体,书写草率值得注意。6号陵西碑亭出土的汉文残碑则有魏碑遗风。7号陵东碑亭出土的汉文残碑刚劲峻拔,端庄严谨,兼有柳体、颜体风格。M182陪葬墓梁国正献王神道碑碑文字体方正饱满,显具端庄严整、气势宽博的颜体特征。M161西碑亭汉文残碑碑文字体大小差异明显,书写随意,不拘法度。西夏陵出土残碑大多碑文镌刻工整,字距、行距疏密有致、布局合理,皆为十分珍贵的西夏文、汉文书法作品,其中7号陵碑亭出土的残碑西夏文篆书、楷书和汉文楷书是我们迄今所见西夏时期书法艺术最为精美者,代表了西夏书法的最高水平。

西夏陵出土残碑碑边纹饰有龙纹、云纹、忍冬纹、卷草纹、蔓草纹、石榴纹等数种。3号陵西碑亭云龙纹残碑边饰朴素大方,纹饰中凿刻痕迹清晰可见,整体风格奔放,给人以大气之感。7号陵西碑亭云龙纹残碑边饰刻工精细,纹饰规整生动,比例协调、适中,是西夏陵碑刻中的上乘之作。6号陵东、西碑亭卷草纹残碑边饰构图简洁、流畅。5号陵东碑亭石榴纹残碑边饰与陵区北端建筑遗址出土琉璃石榴纹滴水图案相同。1、2号陵碑亭遗址采集云龙纹残碑边饰,风格则与7号陵残碑边饰相近,雕刻细腻,龙纹形象生动。M182、M177碑亭卷草纹残碑边饰布局简单,刻制手法不及7号陵残碑边饰娴熟。西夏陵残碑碑边纹饰布局严谨、雕刻熟练、线条流畅,是研究西夏雕刻工艺、纹饰风格的主要素材,为我们研究认识有着相同纹饰图样的文物及其断代、鉴赏等提供了参照标准。

从正式发掘过的11座碑亭看,帝陵、陪葬墓西碑亭都有西夏文碑。西夏陵出土残碑中帝陵碑文明显大于陪葬墓碑文,其中3号陵西碑亭西夏文残碑、5号陵东碑亭汉文残碑、7号陵西碑亭西夏文残碑碑文均有描金,3号陵西碑亭残碑边饰用绿彩填描。陪葬墓碑边饰不见用龙纹纹饰,加之碑石选料、刻工的不同,陪葬墓与帝陵在规模、布局、选址、建筑形制、体量、用材、施色上的差别反映了西夏社会的封建等级制度。

西夏陵出土残碑以少数民族文字西夏文碑刻数量众多为国内所仅有,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碑刻内容,有

① 卢桐:《论西夏文及其书法艺术》,《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第30页。

② 卢桐:《西夏文书法研究初探》,《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第75页。

着很高的文物价值。

（四）传藏、整理情况

20 世纪 70 年代初在西夏陵考古工作时，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便在西夏陵 6 号陵附近建西夏陵考古工作站，此后 6 号陵东、西碑亭，5 号陵东、西碑亭，7 号陵东、西碑亭，3 号陵东碑亭，M177、M182、M161 陪葬墓碑亭遗址出土的残碑，陵区调查时采集的残碑皆存放于工作站。初始调查所采集到的 8 号陵西碑亭残碑收藏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1986 年 10 月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陵工作站及存放文物移交由考古所管理，其中少量大块残碑分别调入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用于文物陈列展览与研究。1997 年 1 月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成立。1997 年 5 月，经宁夏文物局批准，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将西夏陵考古工作站存放在陵区的出土残碑全部移交西夏陵区管理处保存。1998 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清理了 3 号陵西碑亭，出土残碑也存放陵区管理处。1998 年 9 月银川西夏博物馆建成，陵区管理处存放的西夏陵区出土残碑全部入藏西夏博物馆。西夏陵出土残碑因极为破碎，只有其中几十块大块残碑被定为一级文物标本。

西夏陵出土残碑的整理研究随着西夏陵考古发掘工作而开展。1978 年《文物》第 8 期发表《西夏陵八号陵发掘简报》《西夏陵区 108 号墓发掘简报》（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首次公布西夏陵出土残碑，并利用出土残碑考证了帝陵和陪葬墓主人及生前活动等情况。李范文先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参加西夏陵考古发掘时就开始对出土残碑进行整理、缀合与考证。他于 1984 年 11 月出版《西夏陵出土残碑粹编》一书，收录了西夏陵出土西夏文残碑 526 块，汉文残碑 298 块，共计 824 块。对西夏文碑文进行了译释，并根据残碑所载推断出 6 号陵陵主、7 号陵陵主和 M182 陪葬墓墓主。还对残碑中所涉及的人物、民族、官职、地名、纪年等进行了考证，文章功力深厚，论述详备。史金波先生《西夏陵出土残碑译释拾补》^①一文对《西夏陵出土残碑粹编》收录残碑中出现的有关职官、封号、姓名及其他词语等进行了译释和考证。1995 年 8 月许成、杜玉冰出版的《西夏陵》一书，对西夏陵出土残碑列有专节论述，书中收录西夏文残碑 55 块，汉文残碑 31 块，对西夏文残碑做了译释，兼有考证，并就帝陵、陪葬墓主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书后还收录了贾敬颜先生藏西夏陵园残碑拓片 197 片及史金波的考证文章《贾敬颜先生藏西夏陵园残碑拓片简说》。另外在钟侃、吴峰云、李范文的《西夏简史》^②，陈炳应的《西夏文物研究》^③，史金波、白滨、吴峰云的《西夏文物》^④，韩小忙、孙昌盛、陈悦新的《西夏美术》^⑤，卢桐的《西夏文书法研究初探》^⑥与《论西夏文及其书法艺术》^⑦等著作和文章中对西夏陵出土残碑都有论及。

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成立后，特别是西夏博物馆建成后，我们组织人力对馆藏西夏陵出土残碑进行了系统整理，分类、编号和打制拓片，结合前人研究成果进行译释和考证。此次我们编辑《中国藏西夏文献·西夏陵残碑卷》共收录西夏陵出土和采集到的西夏文残碑 1333 块、汉文残碑 767 块，计 2100 块，并将贾敬颜先生藏西夏陵园残碑拓片 197 片也收录其中。全书总计收录残碑拓片 2297 块（片），供西夏学界同仁研究参考。

（马升林）

十五 印章、符牌、钱币卷综述

（一）印 章

西夏建国后铸行官印，受唐宋官印制度的影响，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

① 史金波：《西夏陵出土残碑译释拾补》，《西北民族研究》1986 年第 1 期。

② 钟侃，吴峰云，李范文：《西夏简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79 年。

③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年。

④ 史金波，白滨，吴峰云：《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8 年。

⑤ 韩小忙：《西夏王陵》，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年。

⑥ 韩小忙，孙昌盛，陈悦新：《西夏美术》，文物出版社，2001 年。

⑦ 卢桐：《西夏文书法研究初探》，《宁夏社会科学》1986 年第 4 期。

⑧ 卢桐：《论西夏文及其书法艺术》，《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4 期。

从中原王朝和西夏官印的等次上考察,其所体现的等级观念是一致的。自“隋唐以来,各以印之方长厚薄分寸大小,以别官职之尊卑,品级之高下。非若汉仅以纽授为别也”^①。而西夏《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西夏印章分“司印、官印”两级,“诸司行文书时,司印、官印等纯金、纯银、铜镀银、铜等4种,依司位、官品等分别明其高下”。司印是皇太子、中书、枢密、经略司、正统司及次等司、中等司、下等司等政府部门的印章;官印是三公、诸王、宰相等各级官员的印章。并规定了各等级官印的质地、重量和大小尺寸^②。另外,西夏官印为方形,边长依等级不同而不同。其所用字体,也为九叠大篆,反映了唐宋文化对西夏官印制度的影响。

然而,西夏官印还有其明显的特点。唐宋官印皆用汉字,目前所见西夏官印皆为西夏文;唐宋官印印文为朱文(阳文),西夏官印印文则用白文(阴文);宋代官印印背只刻年款,西夏首领印除年款外多刻有姓名;宋代官印纽上已无穿孔,西夏官印仍保留古代印纽穿孔的形制。这些特点,固然有西夏统治者有意强调其官印与宋制的不同,然而亦有实用的成分。西夏党项族是“马背上的民族”,西夏的军队,多由部落首领统率。印纽上穿孔便于佩带、保管,以适应其游动的生活。

从目前掌握的实物资料看,西夏建国后最早的官印是在崇宁天祐民安六年(1095年),最晚的是桓宗纯祐天庆八年(1202年)。实际上,西夏使用印章还要早。文献记载,宋、夏交战时,宋军多次缴获西夏铜印。从宋元丰四年十月到元丰八年四月,不到四年的时间,在宋夏6次战争中,宋军缴获的西夏“铜印”就有30方^③。说明当时西夏官印已经大量铸行。

对西夏官印的收集和研究,是与西夏学的兴起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清同治元年(1862年)就有著录。如吴云的《二百兰亭斋古铜印存》录有西夏官印3方,但因不识其字,不知其为何印^④。最早认识西夏官印并进行辑录和研究的,是著名学者罗振玉、罗福苙父子。1914年,罗福苙著《西夏国书略说》,收录7方西夏官印^⑤。1927年,罗振玉及其子罗福成在《西夏官印集存》中,集录的西夏官印已达33方,成为我国第一部西夏官印专书^⑥。此后,王静如在《西夏官印考释》中录17方^⑦。1982年,由罗福颐辑录、李范文释文的《西夏官印汇考》出版,集录了西夏官印97方。其中有收藏于国内文博部门者37方,录入旧谱所有者37方,采自日本太田梦庵藏品者18方,来源不明者5方,成为当时集大成的专集^⑧。1988年史金波、白滨、吴峰云出版《西夏文物》中,收西夏官印40方,其中也增补了新见印章^⑨。另外,刘体智的《善斋吉金录》,李培基的《古鉴斋印谱》等著作中,皆收录有西夏官印。

以上各家集录的西夏官印多为传世品。出土发现的西夏官印,首见于内蒙古自治区。1958年,内蒙古伊金霍洛旗首次出土一方西夏“首领”印,1978年、1979年,东胜、准格尔旗又各出土一方。据白滨《西夏官印、钱币、铜牌考》一文统计,各家著录及各地文博部门收藏的西夏官印总计已达130余方。此后,陕西省横山县,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同心县、盐池县,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甘肃省兰州市、民乐县,远及青海省、四川省都有出土和发现,加上民间的传世藏品,估计有150方左右。西夏官印是我国最早使用古代少数民族文字铸造的官印,也是迄今发现数量最多的古代少数民族政权的官印。

西夏官印绝大多数为二字印,尚有六字印5方、四字印17方。其印文笔画曲折重叠,难以辨识。从清末到20世纪70年代,未见有准确释读者。20世纪70年代初,黄振华从西夏文官印背款上的“首领”“大首领”等西夏文楷书受到启示,经过长期揣摩,始释出二字官印的西夏文九叠篆书印文为“首领”二字,从而揭开了西夏官印印文之谜。他对其所见72方西夏官印试为译释,撰成《西夏官印集释》一文,这是对西夏官印篆书印文的最早探索。

① 孔之白:《篆刻入门》,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重印。

②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358~359页。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7、卷319、卷327、卷354;白滨:《西夏官印、钱币、铜牌考》,《西夏文物》,1988年。

④ (清)吴云:《二百兰亭斋七铜印存》,西泠印社,1983年重印。

⑤ 罗福苙:《西夏国书略说》,东山学社印,1914年。

⑥ 罗振玉:《西夏官印集存》,1927年。

⑦ 王静如:《西夏研究》第1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八,1932年。

⑧ 罗福颐辑录,李范文释文:《西夏官印汇考》,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⑨ 史金波,白滨,吴峰云:《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8年。

文献记载：西夏“首领，各将种落之兵，谓之一溜”^①。由西夏文“天盛律令”记载可知，溜是西夏军队的基层组织，其头目是首领。首领是西夏军队的下级军官，由溜中正军中选拔，佩有铜印。

目前所见到的西夏官印，皆为铜制。西夏《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载有“纯金、纯银、铜镀银”官印，并规定金印重一百两，银印重五十两，镀银铜印重二十两、十五两、十二两等，但至今未见“纯金、纯银、铜镀银”官印的传世品或出土者。

西夏官印印文均铸为白文（阴文），但文字形式几乎没有相同的，有的增笔，有的减笔。从字形上看，有的笔画粗，有的笔画细；有的字是方角的，有的字是圆角的。从印文的边框看，有的边框宽，有的边框窄；有的边框直，有的边框斜；有的边框完整，有的边框残缺。细看起来，各方印章其尺寸大小也很不规则，最大的边长 7.5 厘米，最小的边长不足 5 厘米，多数边长 5 厘米多。呈长方形西夏官印的背款，均镌刻成文。多左刻年款，右刻姓名，但也有未刻者，或年款、姓名易位者。组上多刻有西夏文“上”字，但也有漏刻者。背款文字刻线有粗有细，线槽有深有浅，字体有大有小，布局有疏有密，互不相同，并无严格规定的章法要求。

除西夏官印外，还发现有西夏私印和纪年印记，但数量很少。

西夏私印，目前发现有三品。其中有二品原载于《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4 卷 3 号。据罗福成先生介绍，一品为圆形，系“烙印烧于木版之上”，只有一个字，义为“千”，音“都”。另一品不见形状，上面一个字，音“监”或“家”，下面似为押记。第三品为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 B 区 85 室出土的木质一字印，印文为西夏文“茂”字，方形，朱文，印长 17.2 厘米，宽 8.4~10.8 厘米，厚 1.6~2.4 厘米。组上有圆穿孔。现藏敦煌研究院。另外，萧春源《珍秦斋藏印》辑录有 1 方“官”字朱文印，铜质，方形。《乐氏藏古玺印选集》《连赫泉馆古印存》各存录铜质一字方形印。文字至今不识。

上述 6 印，因有押记，又都只有一个字，可能是姓氏，所以称它们为私印，也有称其为杂印者。

西夏纪年印记，有两类。一类有年号和时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馆各收藏有 1 方，甘肃省山丹县“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收藏 1 方。3 方印记均为铜质，方形，印厚 0.8 厘米，通高 2 厘米，边长 4 厘米。朱文印。“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收藏的 1 方有短方柱钮。上述记年印的西夏文印文均为 4 字，义为“元德二年”。其中第 2、3 字的笔画与一般西夏文物所见者略有不同。另一类只有年号，无时间，这是“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收藏的另一方印章，直角长方形，长 3.5 厘米，宽 1.8 厘米，印文为“乾祐”二字，为别处所不见。此外，据陈炳应先生讲，“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杭锦后旗狼山镇附近的一座古城址中，曾出土西夏文石印一方，因已丢失，内容不详”（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因其为迄今所知唯一的石印，故附记于此。

西夏印章对研究西夏印章制度有很重要的意义，并且为考证西夏纪年、研究西夏姓氏乃至民族情况提供了实物资料。早年罗振玉先生在其《西夏官印集存》中，就根据译释年款，“考之宋史”“订正其误”；王静如、罗福颐根据新的发现，也对西夏纪年的错误进行了订正。官印背款上所刻的西夏党项族首领姓氏，如嵬名、耶未、居地、浪讹、讹力、骨匹、嵬岩、骨勒、没讹、岩岩、如定、西玉、西则、酪布、庞青、千玉、都啰等，对研究西夏姓氏甚至民族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

现传世的西夏文首领印有 2 枚“元德二年印”左行均刻有西夏文党项首领姓名，释“骨匹努午”。疑其中 1 枚为仿品。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二）符牌

我国古代所用符节，后世屡有发现，如虎符、鄂君节等，到唐代时才出现牌，据史书记载：唐有银牌。面刻隶字“敕走马银牌”凡 5 字。宋代也曾经有过符牌制度。史载：宋初，令枢密院给券，谓之“头子”。后罢枢密院券，而制银牌，端拱中，又罢银牌，复给枢密院券^②。

与宋同时代的辽、金王朝，承唐宋符牌制度。辽代的符牌有“银牌”（圆牌）、“长牌”“木刻史”（木刻字牌）3 种。宋人王易在《燕北录》中更详细记载了辽的符牌制度，并图其式样：“银牌式：银牌三道，上是番书‘朕’字，用金镀成，见在内侍右承宣朱磷处收索……或有紧急事宜，用此牌带在项上，走马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32。

② 《宋史》卷 154《舆服志》。

与南北大王处，抽发兵马。余事即不用之。长牌式：长牌……上是番书‘敕走马’字，用金镀畔成，见在南北司收掌。每遇下五京诸处索取物色及进南朝野味、鹿茸、果子用。此牌信带在腰间走马。木刻子：木刻字牌……上是番书‘急’字。……每遇往女真、鞑靼国取要物色，抽发兵马用。此牌信带在腰间左边走马，其两国验认为信”^①。

金代的符牌有“金牌”“银牌”“木牌”之分，“收国二年九月，始制金牌，后又有银牌、木牌之制，盖金牌以授万户，银牌以授猛安，木牌则谋克、蒲辇所佩者也”^②。金朝符牌上所用的字，有的说为“‘急速走递’四字，上有御押，其状如‘主’字”^③；有的说“上有女真书‘准敕急递’字及阿骨打花押”^④。就目前已知的实物看，金代的符牌全是长牌，未见圆牌。

西夏的符牌制度上承唐宋，亦与辽金相类。在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西夏符牌的种类有“银符”“铜符”“兵符”等。还使用具有符牌功能的“铁箭”。又据文献记载，宋熙宁二年（1069年），宋军出麟、府“破贼马户川，斩馘数千，获绣旗、木符、领卢印”^⑤故西夏也使用木质符牌。

据史籍记载，元昊每“发兵，以银牌召部长面受约束”^⑥，西夏亦使用“银牌”。宋元丰四年（1081年），夏惠宗乘常被梁太后囚禁以后，“诸酋各拥兵自固”，梁乙埋“数出牌招谕，不从，国内大乱”。天祐民安七年（1096年），“带牌天使”妹纳僧哥投奔宋朝。天祐民安八年（1097年），西夏梁太后兵犯兰州大定城，被知兰州王舜臣率兵追至西夏右厢监军司地，“夏兵返战不克，带牌天使数名皆死”^⑦。

从上述材料可知，西夏的符牌与唐、宋、辽、金有很多相同之处。其一，西夏也用“银牌”。其二，西夏符牌上的文字为“敕燃马牌”，唐与辽的符牌都写为“敕走马银牌”或“敕走马牌”，或“敕走马”。宋朝的符牌上所写文字不见记载，但因在《宋史·舆服志》上，唐宋符牌制度的描述是放在一起的，推测宋代符牌或可亦称“敕走马银牌”。金朝的符牌上写“急速走递”，在文字上与唐、宋、辽稍有差别。西夏称这种急递牌为“敕燃马牌”，“燃”有“火急”之意，表达该牌须火急快递，如燃马飞奔。与唐、宋、辽、金传达皇帝紧急军令的“敕走马牌”“急速走递”牌所表述的意思相同。其三，西夏带牌传递朝命者称“带牌天使”，宋朝带信牌者称“使者”，辽使者则称“银牌天使”^⑧，等等。

西夏符牌尽管文献记载有“银符”“铜符”“兵符”“铁箭”“木符”等种类，但目前所见到的多为铜牌，且皆为传世品，尚无一件银牌出土问世。据初步统计，为一些文物管理部门、博物馆、大专院校及研究机构收藏，或见之于著录的西夏铜质符牌共计27枚。其中，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6枚，故宫博物院收藏4枚，北京民族文化宫收藏2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北京首都博物馆、陕西省博物馆、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博物馆、西安文物管理处、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文物管理所、西北师范大学各收藏1枚；《增订历代符牌图录》辑录5枚，《衡斋吉金识小录》《中国历史图说》各辑录1枚。

从西夏符牌的种类及其功能上分析，西夏符牌可分为信牌、守御牌、宿卫牌等：

1. 信牌，即“敕燃马牌”，西夏文韵书《文海》称：“迅速紧急之燃马上用，故名信牌也”。《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称为“火急符”。现存2枚，国家博物馆收藏一枚，套合式，合盖上刻西夏文楷书“敕燃马牌”四字。其上部有半圆形符嵌，符顶有方形穿口，上片圆牌可嵌入下片符嵌。圆牌两端刻有镀金西夏文“敕”字。另一枚为西安市文物管理处收藏，形制、文字、纹饰均与上枚相同，只是直径略小。

2. 守御牌，是巡逻或守御、执勤军人的名牌，现存8件。圆形，直径比信牌小，多为5厘米左右，上有悬佩釜孔。正反两面皆阴刻西夏文，正面为“防御待命”四字，背面为佩带者西夏人名。如“千叔犬”“千玉宝讹”等。其中有4枚铜上刻有“恭铁黑”，疑有3枚为仿品，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辨别。

① 《辽史》卷57《仪卫》。（宋）王易：《燕北录》，见《说郛》卷56。

② 《金史》卷58《百官志》。

③ 《说郛》卷54。

④ 范成大《揽辔录》。

⑤ （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韩献肃公忠弼之碑》。

⑥ 《宋史·夏国传》。

⑦ 戴锡章：《西夏纪》卷21。

⑧ 洪皓：《松漠纪闻》上。

3. 宿卫牌，为宫廷内宿人员守卫宫廷期间所佩符牌，也是宫内宿卫人员身份的证明。现存 8 枚。多为长方铲形，长约 5 厘米、宽约 4 厘米，上有悬佩釜孔。两面有西夏文字，正面多为“内宿待命”4 字；背面或为人名，或为番号，有的为双钩线刻西夏文“吽”字或“耶”字。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宿卫牌，正背两面均刻“宫门后寝待命”6 字，有释为“寝宫后门待命”者。一面为阳刻，一面为阴刻。其牌形较大，制作精美，应为宫廷寝宫当值人员所佩符牌。

4. 另一类牌，有长方铲形、椭圆形、圆形、桃形、马蹄形等一种形制。其性质、用途不明。有纽，纽上有穿。一面阴刻西夏文一字、三字、四字、五字不等，另一面还刻有人名，如“苏铁黑”“吴移乐有”等。

(三)钱币

西夏行使的货币以铜钱为主，兼用铁钱。官吏俸禄、财物计算、劳力计值、借贷赏罚等，皆以钱币计算。

西夏建国前后，使用唐宋钱，杂有秦汉、北朝、五代、辽金等钱。据西夏故地近 20 多处窖藏钱币统计，北宋钱多在 80% 以上，有的高达 97%，而西夏钱则不足 2%，且以“天盛”“光定”钱居多。如宁夏回族自治区大风沟发现的西夏窖藏，有两汉、隋唐、五代、两宋及辽、金、西夏等朝钱币 115 种，计 33 公斤、8500 多枚。经计量统计，其中北宋钱最多，占 84.7%，而西夏钱仅占 1.42%。西夏陵 M182 号陪葬墓出土的钱币全是宋钱和唐钱，没有一枚西夏钱。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西夏省嵬城遗址出土的钱币有 135 枚，也全是宋钱和唐钱，没有一枚西夏钱。甘肃省武威地区文教员院内发现的西夏窖藏钱币，多达 10000 余枚，重 42 公斤，其中绝大多数是宋钱，只有少量西夏钱币。

上述西夏墓葬、遗址、窖藏出土的钱币，说明终西夏之世，在其境内主要流通北宋钱，西夏钱极少。但局部地区也有例外，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达拉特旗、包头市等地发现的铁钱窖藏，有的出土多达数千公斤，除少数北宋“宣和”“政和”钱外，皆为“天盛元宝”“乾祐元宝”铁钱。西夏法典《天盛改旧定新律令》载：西夏“诸人不允去敌界卖钱，及匠人铸钱、毁钱”^①。西夏中后期，为防止铜钱外流，而仿照宋朝设置陕西路、河东路铁钱区的做法，将沿金边界地区（今内蒙古自治区黄河以南地区）设为铁钱区。

依据年号钱币实物，西夏钱始于“福圣承道”年间（1053~1056 年），而《宋史·夏国传》记载仁宗天盛十年（1158 年）五月“始立通济监铸钱”。这表明，天盛年以前虽没有建立铸钱的专门机构，但已有某个机构兼管铸钱事宜。只是因为西夏依靠宋朝大量赐钱，而宋、辽又严禁铜铁出口，西夏缺乏铸钱原料的缘故，所以西夏铸钱数量极少。到了天盛年间，由于金政权占领了山西、陕西、甘肃等原属宋政权的地区，控制着榷场，西夏再也不能靠南宋王朝大量赐钱了，这才设立了专门铸钱机构通济监，被迫大量铸钱。“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记有“钱监院”，或为汉文文献记载的“通济监”之属^②。

西夏钱币制度受北宋影响很大。北宋流行年号钱，盛行对钱。目前所见到的传世和出土的西夏钱币，均为仿宋钱制铸造的年号钱。北宋钱文书体以楷书为主，兼有篆书、行书，西夏汉文钱书体也有楷书、篆书、行书之分。1984 年，在贺兰山滚钟口出土了西夏“乾祐元宝”行书、楷书对钱、“光定元宝”篆书、楷书对钱，更证明了北宋钱制对西夏钱币制度的影响。

最早著录西夏文钱币的著作是南宋洪遵（1120~1174 年）撰作的《泉志》。《泉志》卷 11 载：“右梵字钱。余按此钱径八分，重三铢六参，铜色纯赤，文不可辨，大抵类屋驮、吐蕃钱”。至清道光七年（1827 年）初尚龄撰《吉金所见录》卷 13《宋伪品·西夏》中附载西夏文大安宝钱一品，称“右西夏梵字钱。洪志梵字钱径八分……刘青园曰：凉州土人掘地，得古钱数瓮，其中开元最多，北宋，辽钱及西夏元德、天盛、乾祐、天庆、皇建、光定诸品，亦复不少。而此种梵字钱，亦有数品，余共拣得千余枚。又尝于凉州大云寺访得古碑，碑阳面正作此等字。碑阴楷书，扣读之，则天祐民安五年所立，乃知此钱为西夏梵书。景严作《泉志》时，即不之识，数百年后，破此疑案，亦快事也”。刘青园根据当时刚发现不久的西夏文凉州感通塔碑与西夏时期的汉文钱币窖藏，考定《泉志》所载“梵字钱”为“西夏梵字钱”。洪氏收录西夏文钱，按宋人习惯称西夏文为“蕃书”，西夏文钱可称“蕃字钱”，“梵”“蕃”音同，后来在《泉志》中就将“蕃字钱”称为“梵字钱”，用以泛称少数民族文字的钱币。

①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 年，第 287 页。

②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 年，第 224 页。

在刘青园撰《吉金所见录》之前，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梁诗正等奉敕撰修《钦定钱录》16卷，载西夏文钱，仍称“梵字钱”。《吉金所见录》识破西夏文钱之后，李佐贤撰《古泉汇》，方若撰《言钱别录》皆悉引为据。在《古泉汇》和鲍子年的《古泉丛书》中，增录西夏文钱三品，为大安、乾祐、天庆宝钱，但对西夏文义仍不能释。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英国学者卜士礼(T.W.Bushell)开始用相同年号的西夏文钱和汉文钱对照来释读西夏文字。1914年，罗福苣《西夏国书略说》中附载西夏文福圣、大安、乾祐、天庆宝钱，声称“此为以前古泉学家所未知，兹悉抚印四泉于册，以告世之治古泉学者”。

西夏钱币有西夏文钱和汉文钱两种。以钱币材质分，有铜、铁两种。西夏文钱有“福圣宝钱”“大安宝钱”“贞观宝钱”“贞观宝本”“乾祐宝钱”“天庆宝钱”等6种，其中“贞观宝本”钱，不用“宝钱”“元宝”，而用“宝本”，十分特殊，值得进一步研究。汉文钱有“大安通宝”“元德通宝”、折二“元德重宝”“大德通宝”“天盛元宝(有铁钱)”“乾祐元宝(有铁钱)”“天庆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等9种。现分叙如下：

最早明确著录西夏汉文钱币的钱谱，是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梁诗正等奉敕撰修的《钦定钱录》。其中载西夏汉文钱有“天庆元宝”“天盛元宝”二品，但误定“天庆元宝”为辽钱。之后，初尚龄《吉金所见录》著录西夏汉文钱币6种，即元德通宝、天盛元宝、乾祐元宝、天庆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李佐贤在《古泉汇》中，除录以上6种外，又增加了“天盛元宝”“乾祐元宝”两种铁钱。

汉文钱则多归属于辽或金。唯清代孟麟撰《泉布统志》列大安元宝汉文钱为夏钱，但不见传世品。1981年七月内蒙古林西县三道营子的窖藏钱币中，发现“大安通宝”1枚。内蒙古自治区吴宗信从窖藏遗址及下限时代，铸币风格与铸造工艺等方面考证，定为西夏惠宗所铸大安钱。

《吉金所见录》附载为“元德通宝”钱大小二品。初尚龄认为，按史载西夏于元德时并无开铸之事，然其“钱形模字画有唐宋遗制”，虽与其他西夏钱不类，似非伪品。《陇右金石录补》引《古泉汇考》：“陈莱孝曰，天庆元宝钱，西夏桓宗李纯佑铸……辽天祚帝铸天庆钱，不如此钱精好，与天盛、乾祐等同体，见于初氏铸谱。后凉州掘河得此与元德、天盛并贮瓶中，制作文字确是夏钱，与天盛、乾祐、皇建、光定诸钱相似，与辽天庆元宝钱迥别”。近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曾出土“天庆元宝”钱，亦有传世品。

1984年9月，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山滚钟口西夏货币窖藏中，首次发现了汉文篆书“光定元宝”，与真书成对品。据报道，“此钱生坑出土，品相极精，光、定、元三字篆书，书法功整，宝字则隶化，制作风格仿宋隶宝钱”。可见西夏有对钱遗风，说明西夏钱制确实受宋代货币文化的深刻影响。

另有传世西夏文折二“福圣宝钱”、折二“大安宝钱”，当为伪品；旧谱所载“正德元宝”“大德元宝”“应天元宝”等钱，以及《泉布统志》著录之“大夏颁行宝钞”“大夏军营宝钞”等纸币，亦均属伪作。传世之“天授通宝”“韶都元宝”“乾定元宝”，是否为西夏钱，待考。

西夏钱币，就其版别而言，有大小之分。大的如西夏文“大安宝钱”，直径3厘米以上；小的如汉文钱“元德通宝”，直径2厘米多一点。但一般说来，汉文钱直径2.3~2.5厘米，西夏文钱略小些，钱直径2.2厘米。同一时期的汉文钱，大小也不完全一致，如甘肃省武威市出土的3枚“乾祐元宝”，有2枚直径2.5厘米，1枚只有2.4厘米，钱廓较小，似被剪边。

一般说来，西夏的汉文钱币轮廓规整，文字清晰秀丽，表明其铸钱技术较高。西夏文钱的文字则比较粗糙。但有的西夏文钱篆书与楷书并用，笔画繁简不一，是研究西夏文字有价值的资料。与辽、金相比，西夏钱币的最大特点，是将本民族文字铸于通行钱币上。而辽、金作为与西夏一样的少数民族政权，也有自己的契丹文和女真文，但尚未见在流通钱币使用。

(贺吉德)